

2020.06 第19期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I HAVE A DREAM

I CAN'T BREATH

SOCIALISM IS THE SOLUTION





主管单位

红新公社

主办单位

《进步》杂志编辑部

合作/转载单位

星火联（合作）
人民斗争社（合作）
国际红色通讯（转载）
红色文献翻译（转载）

联系方式

邮箱：JINBUBIANJIBU@protonmail.com
知乎：进步
B 站：进步杂志
脸书：马立新

社长

江 克 甫

总编辑

王 政

编辑

王 政　石 诚 利

校对

王 政　石 诚 利

排版

石 诚 利

封面设计

王 政

美工设计

王 政

★点击目录**某年 某月刊**处，可在MAGA网盘下载往期杂志（须科学上网）；或通过上方邮箱发邮订阅（注意不要使用QQ邮箱等容易屏蔽外网的邮箱）




语　录

只要作为北部的真正政治力量的工人竟容许奴隶制玷污自己的共和国，只要他们在那些不问是否同意就被买卖的黑人面前夸耀白人工人享有自己出卖自己和自己选择主人的高贵特权，那他们就既不能取得真正的劳动自由，也不能支援他们欧洲兄弟的解放斗争；不过，这种进步道路上的障碍现在已被内战的血浪扫荡干净了。

——马克思《致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




征稿通知

鉴于《进步》杂志发展的需要，特向广大工人团体或个人、进步学生团体或个人、进步群众团体或个人持续征集稿件，稿件题材如下：

1. 当代工人/左翼文艺作品
2. 现代左翼文艺作品赏析或导读
3. 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或导读
4. 国内国际时事评论
5. 读者来信以及建议

……

文献引用建议以我们网盘提供的参考资料为准，格式建议与本刊标准一致。如有其他类型的文章亦欢迎投稿，我们也欢迎左翼组织或者进步个人和我们洽谈合作/转载事宜，具体联系方式见本页上方。

注意：本刊为**免费**期刊，欢迎**不作商业用途**的转载，同时我们会尽可能为投稿人支付稿费，希望各位能配合和理解我们的工作。**本刊暂不接受资助。**

《进步》杂志编辑部



2020年 6月刊



We Breathe Together

——驳斥关于弗洛伊德事件的种种谬论

石诚利

“I can't breathe”，警察膝盖下乔治·弗洛伊德的呻吟一声比一声微弱，全美乃至世界各地反对种族迫害的抗议随之一声比一声高涨。

5 月 25 日，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几个警察以“使用伪钞”的罪名逮捕黑人男子乔治·佩里·弗洛伊德，在所谓的执法过程中，警察把弗洛伊德脸部朝下按倒在地，其中一个用膝盖压迫脖颈，弗洛伊德被压在地上无论如何哀号恳求也无济于事，施暴过程持续了将近三分钟，一个小时后，弗洛伊德被宣告不治身亡。

弗洛伊德之死又一次揭开了美国种族迫害的血腥一角，热爱正义与平等的美国人民被激怒了，他们不顾当下形势日趋严峻的新冠疫情，从太平洋海岸到大西洋海岸，人们纷纷走上街头，掀起控诉美国种族主义暴行的浪潮。在美国之外，世界各地义愤填膺的群众也通过游行示威的方式，在美国驻当地使馆、领事馆或其他地方声援美国人民的抗暴斗争。这场如火如荼的斗争运动中，有黑人、白人，也有我们这样的黄种人，大家不分肤色，并肩而行，向这自 16 世纪“三角贸易”以来的黑人悲惨史发出共同的怒吼！

在这一历史时刻，以特朗普为首的美国政府秉承了一切资产阶级政府的一贯“才能”：一方面对新冠疫情态度漠然、应对不力，致使全国十几万人死亡；另一方面却不遗余力地向抗议示威地区投入军警，用警棍和催泪弹镇压示威群众。由于害怕抗暴斗争殃及自身，特朗普甚至一度灰溜溜躲进白宫的地下室；两天后，他又从地下钻出来，在一座被烧毁的教堂前，装模作样地举起一部《圣经》，叫嚣“我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

这场被我们某些媒体称为“暴乱”的斗争，所面对的敌人不只是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和穷凶极恶的暴力机器，还有那些杂七杂八企图诋毁、否定的流言蜚语。

有人说，受害人弗洛伊德自己就不安分守己，他吸毒，曾因非法持有毒品和持械盗窃多次被捕入狱，尸检时还发现他感染了新冠病毒。有人声称“弗洛伊德是整场案件的唯一受益者”，乃至发问“弗洛伊德的葬礼至于弄得跟伟人一样吗？”

某些中国人似乎很相信“一个巴掌拍不响”“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一套，出了事不是谴责暴行、谴责加害者，而是从受害者身上做文章，但凡能找出一丝蛛丝马迹，就说明那人是“活该”，是“咎由自取”，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可是在回答这个愚蠢的发问前，让我们先翻翻历史吧：1955 年，黑人女性罗莎·帕克斯仅仅是因为不愿意给白人让座，就被逮捕；1957 年，阿肯色州州长动用国民警卫队，阻挠九名黑人学生进入小石城中央高中

就读；1968 年，主张“非暴力”的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被暗杀；2014 年，黑人烟贩埃里克·加纳被警察怀疑出售没有纳税的香烟，在逮捕过程中被“锁喉”致死……上面列举的只是九牛一毛，这些受害者中，从孩子到成人，从男人到女人，从底层民众到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是清白的守法公民，甚至堪称“完美受害者”，但终究难逃种族主义的迫害。所以弗洛伊德被虐杀的事实，与他之前做过了什么，真的有什么关系吗！

是的，弗洛伊德犯过罪，但根据美国法律，那也应该由法院判决，而不是被警察在大庭广众下杀死，这一点无从狡辩。弗洛伊德固然不是“伟人”，但他却是受压迫黑人的一个代表，人们走上街头不是纯粹为了弗洛伊德个人，而是要求将种族主义流毒连根拔起，这不是政客们下跪作秀就能平息的！

有人说，各地的示威者已经破坏了多所教堂，并且推倒了数不清的名人雕像，包括哥伦布、华盛顿、杰斐逊、丘吉尔、甘地……示威活动正在走向“历史虚无主义”，正在摧毁文化。

“*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那么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倒塌下来。*”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如此结尾。19 年后的 1871 年，巴黎公社委员会下令拆除这“野蛮行为的纪念物”“武力和虚荣的象征”，旺多姆圆柱被绞断成三截，铜像也被摔碎了。这些雕像被推倒的名人，有的发表过种族歧视的言论，有的本身就与黑奴脱不开干系，在这个种族歧视横行的时代，雕像不仅是对这些大人物的标榜，同样也是几百年种族歧视史的象征，是种族主义者的挡箭牌——就像那根被绞断的旺多姆圆柱。如果种族主义强大到一时无法被推倒，群众就会转而推倒那些象征，以表明自己的决心。罪责不在于群众，而在于种族主义，只要种族主义存在一天，以后还会发生同样的事，直到种族平等真正降临地球，雕像才会仅仅作为雕像而“安享晚年”。

诚然，这种行为并不能消灭种族主义，也造成了一些破坏，这反映了一些示威群众的局限性。但是请看看吧：西雅图的列宁像屹立不倒！这座从原捷克斯洛伐克某废料场带到美国的雕像，曾经有很多人想要拆掉它，但它依旧被保留至今。这是鲜明的对照，它很好地揭示了历史唾弃什么，呼唤什么。

又有人说，示威者不仅破坏教堂、推倒雕像，还打砸抢烧，破坏公私财产，胡作非为，所谓反对种族主义斗争，不过是打着正义的旗号的暴乱罢了。

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这反映了一些示威群众的局限性，他们的觉悟还不够高，同时在示威人群中，也确实存在浑水摸鱼之徒。这证明运动需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需要被更加有纪律、更加行动一致地组织起来，但不能说整个运动是错误的。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真正温和的行动不是没有

过：提倡“非暴力”的马丁·路德·金，他在会场周围安排纠察队，专门制止暴力行为；后期的黑豹党放弃暴力主张，专务黑人社区服务。可是最后又如何呢？

更何况，之前美国的“和平”与“秩序”，又给黑人带来了什么好处？暴力机关，加上 3K 党这类反动社团，他们对黑人的迫害，要远比历次运动造成的破坏多得多。即便做个清白的守法公民也不能幸免于难的话，又怎么能苛责示威者要继续“*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呢！

“之前这样的运动已经搞过许多次了，这次估计也一样，不会有什么实质改变的。”

从美国建国起算，最初黑奴用逃跑或直接反抗的形式来反对压迫；到南北战争时期，大量黑人士兵支持主张废除奴隶制度的林肯；二战结束后，受马克思主义的感召，黑人民权运动兴起。从“布朗诉教育委员会”到组建密西西比州自由民主党再到公平住宅运动，从推崇“合法斗争”的马丁·路德·金、约翰·刘易斯到主张暴力的黑豹党、马尔科姆·X，种族隔离被取消、政治权利相对提高、生活得到改善，黑人的命运从不同程度上被推动着。尽管这些斗争都没有从根本上消灭黑人受压迫的现象，但美国人民已经得到了历史的教育，当类似的迫害再次发生，人们就会迅速集结起来，给种族主义分子一点颜色瞧瞧，相比于万马齐喑，这难道不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吗！

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参与到这一进程中，然而由于历史原因，没有实现对运动的领导。我们尤其不能忘记，现状的根源在于美帝国主义，而打倒帝国主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不仅仅是少数族裔的事业，更是全美乃至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事业——运动需要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而我们正在耐心等待这一天的到来。

“黑人有‘政治正确’、有‘Black Lives Matter’保护，他们到底还要奢求什么呢？”

是的，美国的那套“政治正确”可以说发展到病态的程度。美国黑人不能叫“黑人”，而应该叫“非裔美国人”（African American）；影视作品不能没有黑人，而且也不能是反派角色；西瓜、炸鸡也被视为歧视的象征；我们说汉语“那个”和歧视黑人的英语单词“Nigger”同音，于是也被禁止……如此荒诞的“政治正确”例子不胜枚举。

可要我说，“政治正确”的背后不是黑人受到优待，恰恰相反，黑人受压迫的处境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种族歧视在美国的社会根基是如此深厚，以至于每一处生活细节都会让黑人草木皆兵，在这样一个高压环境下，黑人既然不能铲除歧视的根基，就只好希求在细枝末节上缓解痛苦。黑人要争取人权，要在经济、政治、教育等方面获得同等的权利，但是作为幕后黑手的美帝国主义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好处，于是一边打压黑人的正当诉求，一边又抛

出“政治正确”来粉饰太平，营造出尊重黑人权益的假象，把罪责转嫁给白人群众，并挑拨同为底层的黑人与白人内斗。白人群众受到帝国主义的刁难和愚弄，反而会归咎于黑人群众，进而用种族歧视去“反对”“政治正确”，黑人群众继续受到歧视，与白人群众间的矛盾就会加剧，甚至会造成流血冲突——这正是帝国主义分子所乐见的。

有黑人血统的奥巴马坐上美国总统的宝座，这可以说是“政治正确”的胜利，然而仅在他任内的 2014 年，就相继发生了两起警察杀害黑人的案件：7 月 17 日黑人烟贩埃里克·加纳被警察“锁喉”致死，司法部不予起诉；8 月 9 日，弗格森镇的一名警察枪杀黑人青年迈克尔·布朗，大陪审团不予起诉。而弗洛伊德被杀后不到一个月内，又有几起警察杀害黑人的案件发生。黑人得到了矫揉造作的“政治正确”，生活状况却仍然糟糕，在社会上却仍然受歧视，甚至稍有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

要想让荒诞的“政治正确”消失，不是去否定它，而是要实现黑人实质上的平等权利，这和我们前面提到的推倒雕像的行为是一个道理。

有人觉得，他们就是活该，他们素质低下、犯罪率高；更重要的是，近年来黑人大量涌入中国，占用本地资源，抢了本地人工作，并且造成了很多恶劣影响；他们受到特权般的优待，进而仗势欺人，侮辱、殴打中国人……更有甚者拿欧美做例子，宣传如果允许黑人定居本地，他们就会跟本地男人抢女人，污染中国人的基因，让炎黄子孙有亡族灭种的危机。

在媒体上我们经常会接触到大量有关黑人的负面报道，且不说国外，对于身处本国的黑人，近来网上关于黑人的一系列负面报道，让国人往往将他们与传染病、抢劫、斗殴、滥交、性侵挂钩，而黑人中有不少属于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被称为“三非”黑人。在华黑人（其实应该是外国人）的报案似乎能得到更高效的处理，以至于后来出现了“老外代报案”的街头广告；外国留学生在本国高校似乎受到比本国学生更优的待遇，住宿条件比本国学生更好，而之前某大学的“女学伴”事件也加深了人们的这一印象。

在《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布的时候，我曾对此做过评论，我反对任何种族歧视，无论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的。前面所反映的现象是现实存在的，这一点没什么好否认的，然而这些现象果真能证明我们应该反对黑人吗？

现在我要再提一个问题：有多少人真正在现实中接触到黑人？我想除了少数人以外，大多数人没有接触过，他们只是从网上看了一些消息，便下结论。更有一些极端的人，他们不需要数据，不需要调研，只是借着由头去宣扬自己那套私货罢了。如果真要论对本国人做的坏事，本国人自身做的要比外国人多得多，但有些人把做坏事多的人划为“同胞”，却将做坏事少的人拒之门外，不可不谓奇也怪哉。

再者，有人把黑人的现状归因于人种，说他们有暴力基因，说他们身处热带所以懒惰、脑容量小所以愚昧等等。殊不知，过去帝国主义分子也是用同样的言辞污蔑我们的；殊不知，鼓吹这一观点的纳粹早已身败名裂了。黑人的现状是新旧殖民主义的历史原因造成的：他们长期遭受掠夺剥削，所以贫穷；他们因为受压迫和贫穷而缺乏良好的教育，进而有犯罪滋生。我们要认识并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经济与历史入手，改变黑人的境遇，消灭犯罪的土壤，而非诉诸这类纯属无稽之谈的伪科学。

至于认为黑人受到过分优待的人，又为什么要将矛头转向黑人自己，而不是“政治正确”及其政策的制定者呢？那些制定者才是真正的“麻烦制造者”，难道不是这样吗？

那些口口声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人，那些耸人听闻、渲染“子宫战争”的人，女性在他们眼里似乎不是同胞，而是一种“资源”，女性不能按照她们自己的意愿婚配，反倒要受他们支配，像商品一样——这是何其令人作呕，又何其令人发笑。我曾经在评论里说过：*“有了‘我族’和‘异族’，‘纯种’和‘不纯’就会随之而来。”*我们有了种族歧视，也就同样会有民族歧视、地域歧视，歧视者终将因歧视而自吞苦果。

说一千道一万，问题不在于弗洛伊德和示威者，而在于一小撮人搬弄是非，煽动仇恨，欺瞒不明真相的群众。

我们回想起那段被称作“东亚病夫”“黄祸”的屈辱史，当时列强对我们又鄙夷又害怕，处处欺侮我们，在文艺和媒体上大肆丑化、妖魔化我们，把中国人描绘成脑后长猪尾巴、素质低下、猥琐卑鄙的怪物。美国资产阶级让华工拿最低的工资，干最苦最累的活，却以“华工抢了本地人工作”的名义通过《排华法案》。中国人没有因为被歧视而一蹶不振，我们的先烈前仆后继，扫清内外敌人，用鲜血捍卫了中华民族的生活与尊严，证明我们并不是帝国主义分子口中的“东亚病夫”“黄祸”。将心比心，任何一个中国人，在看到为反对种族主义而奔走的人的时候，难道不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我们的近代史吗？难道不会与受压迫者产生共鸣吗？难道不会鄙夷那些针对斗争的诋毁吗？难道不该从道义的角度上支持吗？难道不该为他们的斗争而欢欣鼓舞吗？

今天有的人，脑后没有“尾巴”，脑内的“尾巴”却翘翘起来了，不知道哪来的底气去歧视别人，仿佛这样就能让他们体验到当年洋老爷的快感。他们也有为运动叫好的，但不是为了消灭种族歧视，纯粹是幸灾乐祸。当需要抒发对“北美奴隶主种族灭绝反人类匪帮”的“义愤”时，他们就把黑人推出来；一旦要他们真正关心黑人的处境，他们就立马换上一副居高临下的“白面具”了。这终究不过是沙文主义的滑稽表演罢了。

不久之前，有人硬说弗洛伊德事件跟种族歧视无关，是“民主党人的诱导和美国资本家宣传下”的结果，还说什么“你当白人，美警就不开枪了？”可是有个美国黑人辱骂中国女收银员，那人倒控诉“黑人这么歧视中国人”了，也不问“你当白人，黑人就不骂你了？”至于之前的发言，大概是被他填肚子了。可笑的是，别人要平等，是要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平等；这位要平等，是要受迫害的“权利”“平等”。因为你们受迫害的“权利”“平等”，所以你们就无权表达不满，否则你的不满就破坏了这份“平等”——原来这是在教别人怎么当奴才呢！

还有的人自封左翼，却经常开一些恶心人的“Nigger 笑话”当做幽默，当面对诘问时，要么狡辩自己没有恶意，要么就拿“这个问题的本质是阶级问题”当挡箭牌。

种族问题的本质是阶级问题，这没错，然而这绝不是说种族问题是毫无讨论的价值。“本质是阶级问题”，说的是无产阶级应当紧密团结起来，反对打着民族、性别、职业等旗号搞脱离于整个无产阶级利益的宗派（比如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里的“崩得”分子）。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关注种族问题，我们要争取受压迫种族的权益，提供必要的帮助，并尊重他们的信仰与习俗（只要不是反人道的），因为种族问题不单是当前阶级关系的结果，它也受历史因素的影响，是历史上的阶级关系的沉淀。受历史上新旧殖民主义的压迫，黑人有的被贩卖到非洲以外的地方，有的被殖民者鸠占鹊巢。白人统治阶级为了榨取超额剩余价值，就借用种族主义竭力镇压黑人的反抗，并通过意识形态灌输分化劳动者，让白人劳动者仇视黑人劳动者，让黑人劳动者产生身份自卑。也就是说，种族主义本身就是巩固剥削制度的工具，要结束资本主义制度，就必须承认种族压迫的现实，并致力于消灭这一压迫。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什么左翼，而是“苹果人”——红皮白肉。

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在同一片天空下共呼吸，有着唇亡齿寒的命运，任何企图挑拨仇恨的流言蜚语，都是包藏祸心且愚蠢的。全世界人民不分肤色、国籍，都应当团结在国际主义的旗帜下，为打倒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而奋斗。我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的子孙后代将手挽着手，共同迎接自由平等的曙光！

日本人民在前进

可靠的小历史家

第十三章 大正维新晴空下（下）

5月26日，日军驻防水户市的一个本来就不满编的联队在伤亡大半之后被迫退出水户，日共得以解放出两个联队的兵力增援西线。日本人民解放军的总参谋部随即制定了一个旨在歼灭进犯长野县的日军两个联队的计划，并且已经调动了第七联队、第八联队大部和第五联队的部分，准备进攻。

正当第七联队和第八联队大部已经移动到佐野市一带的时候，日共的监听部门发现了一些异常情况——在日本当局的电报当中，不知不觉的多了几份日共的行动计划，而且行军路线也被如实上报给日本当局。

进一步加大监测力度的监听部门很快确认，日本当局在人民政府的一个部门里打入了一个间谍，而且保密程度较高，监听部门单凭监听到的电报仍然不能确认到底在哪个部门。

日共中央在得到监听部门的报告后决心将计就计，便派出特使前往长野军区，并且让特使指示长野军区回复中央说此计划不可行，以此确认间谍所在的部门。不料，间谍隐蔽得很好，这些措施并没有把他钓出来，倒让他有了防备，还向着日本当局提醒说日共已经注意到了他。

这点挫折并没有让日共中央灰心。一方面，日共中央命令第七和第八联队的大部暂时驻扎在佐野-结城-笠间市一线，另一方面则加紧了对这个间谍的搜查。

然而，整个间谍事件的突破口却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发生了——一位在乡村的学生预备党员突然向党组织自首，表示自己是日本当局派来的间谍，来破坏土地改革的。问到他为什么要自首的时候，他是这样回答的："我看到村民们站在台上，大声控诉地主的罪恶的时候，不由得想起家里仍然在劳作的父母，晚上几乎睡不着觉……每一想起父母已经被劳作压坏的身躯，我的良心就在发抖哟……"

在日共内务部门保证了不对外揭发他的间谍身份，并不对他做出任何惩罚以后，他就开始大吐特吐和他有关的间谍网络。内务部人员一听，好家伙，竟然牵扯到三个部门二十来人，不敢怠慢，连忙向着中央汇报。日共中央在仔细研究这些人的资料之后，猛地发现其中一人正好符合能够接触到电报的人员身份，立刻下令对相关人士进行抓捕。

日本当局派出的这些间谍，毕竟还是远远不如有后世资料支撑的日共内务部。很快，被捕的间谍都陆陆续续败下阵来，吐出了真相，亦或是牵扯了更多人下水。在日共中央亲自下场阻碍事件扩大化以后，日共内务部最终还

是把一百余人的间谍网扯了出来。

在破获这个间谍网以后，6月4日，第七联队挥师北上，于6月7日同正在包围富山的第四联队大部会师，并且加紧了对富山市的猛烈攻势，两侧试图救援的日军都被打退。一时间，告急的电报如同雪花般飞到日本当局的办公桌上，气的各路财阀和军头都是一阵跳脚。

日军小队长坂本毅喘了口气，看着远处日共已经挖的密密麻麻的工事，不由得大为沮丧，把手中的铲子抛到一边，顺着自己好不容易挖出来的坑道滑了下去，暂时休息一下。从五天前开始，日共的两个联队就把富山的陆路交通全部切断，把整整一个联队围在了城里。尽管粮食还够吃，但是弹药储备和日军士气都极为堪忧。

在把日军围起来以后，日本人民解放军也试着对富山市区进行了几次进攻。无奈进入富山的路线只有几条，日军死死把守着这几个缺口，日本人民解放军也无可奈何。到第三天以后，日本人民解放军就转而使用火炮轰击日军阵地。在日军看来，这就是日本人民解放军认怂的表现。

但是接下来的一件事却使得富山守军忧心忡忡起来了：日共开始在两侧的黑布市和高冈市挖掘防御工事，而且是面向两边的！日军曾经试着从海上获取补给，结果运输船被西侧的日共大炮照着港口坐标一顿乱轰，十条里当场沉了两条，两条重伤。在这次战斗之后，日共又调来数门大炮，设置了多个观察哨，专门确定日军运输船的方位。

得，海上运输基本上运不来什么东西了。

坂本毅一边胡思乱想着，一边爬起身来，继续挖掘着附近的土地。但是，还没等他醒过神来，日共方向突然传来几声巨响，然后就是几个黑乎乎的东西从天而降。坂本毅和小队的士兵定睛一看，竟然是一堆导火索上还冒着火星的炸药包！

日军立刻被吓得肝胆俱裂，有的试图把炸药包投掷出去，有的试图灭火。还没待他们决定到底要干什么，又是几十个炸药包从天而降，一下子把日军的心思全部浇灭了。这帮家伙马上慌不择路，往市区方向不要命的逃窜。

“轰”的一声，一大堆炸药包瞬间炸开，随后落在附近的炸药包也陆陆续续爆炸了。坂本毅感觉自己好像被一枚巨锤砸中了胸口，眼前一黑，就没了知觉。

如果有人在空中俯瞰，就会发现此时日本人民解放军已经集中了大量部队，对着今滑川市一带的日军发起了猛烈攻势。而他们的当面之敌，已经在“没良心炮”的轰击下损失惨重，完全不能阻碍日本人民解放军的攻势。短短半小时，在失去东线部队联系的日军联队部尚未做出反应的时间里，日本

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大队已经率先攻进富山市区东部，而在南线防备日共山区部队的日军则连连告急，表示日共正在前后夹攻。

很快，南线防备日共的一个大队就被前后打了个对穿，残部匆匆忙忙向着市区撤退。这一下，日共在山区的一个大队也迅速出动，同东线友军一起猛烈攻击市区驻军。才反应过来的日军联队部此刻已经是焦头烂额，就连预备队都丢进去了，但是丝毫不能阻碍日本人民解放军的猛烈进攻。本来就依托于防御工事才堪堪维持住阵地的日军在无工事的情况下很快就被击溃，日共的先头部队直插后世的神通川公园。

正当日军上下勉力支撑的时候，日军联队长倒是心生退意，偷偷摸摸带着一众高级军官和高级官员逃上最后一班船，溜之大吉了！等到日军大队长们一脸懵逼的看着人去楼空的联队部的时候，已经是半个小时之后了。很快，这几个大队长要么投降，要么出逃。

一日之内，富山易手。

6月15日，在东京群众的一片懵逼当中，日共展开了对东京市区的妓院的全面清理。一队队士兵涌进各大妓院，把妓女和老鸨统统拉出来，并且在妓院门口贴上封条。东京市委早在5月11日就向中央提出了要求，但是由于各方面兵力急缺，新生政权兵员不足，一时间予以搁置。现在有了足够的机动兵力，自然派兵来处理这些“第三产业”了。

东京的这些妓院，本来在革命当中就受到了严重冲击，消费人数急剧下滑——有钱人都被吊了路灯或者关了起来，日共还当着群众的面在市中心来了一次诉苦大会，一次性把有明确恶行的三十多个大资本家和粮商全部吊了起来，群众拍手称快。

从这以后，妓女和老鸨就开始提心吊胆，有门路的就尽量往日本白区逃窜，没条件的只能每天担惊受怕。正当她们即将放松下来，以为啥事没有的时候，倒是被领出去，心中的恐惧自然非常之大。但是在荷枪实弹的士兵面前，她们又不敢乱搞，只好私下咬耳朵。最后，东京市的全部妓女和都被关进了横滨附近特地设置的一间“学校”，日共将在这里对她们进行改造和审查。

至于部分没跑掉的老鸨，日共已经把她们全部跟城市罪犯关在了一起，就等着妓女们学习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开始公审。

正在日本人民政府清理封建社会的余毒的时候，日本的代表带着屈辱的眼神在一份出让大量利益的条约上签了字，以此换取了美国、英国的军队和军火支援。得到这个消息的日本财阀和政府一起拍手叫好，并且高高兴兴的计划好了这几只部队将要调往哪里。

同时，日本当局还不顾远东苏军转入攻势，逐步将西伯利亚的陆军向东撤退，试图缩减出一个师团来回援本土。在本土，日本当局还大肆征发预备役，强行将不少农民从土地上拉走，使得白区农业遭到了严重的损失。而日共九州地委则顺势鼓动农民，掀起了大规模的抗议征兵和租佃争议运动。

与此同时，日共的关东地区暂时稳固下来，日共中央也开始施行一定规模的财阀国有化政策，并且开始对分散的生产资料进行一定的整理，开始推行集体化和合作化政策。困于干部规模和干部经验的不足，日共的行动始终非常迟缓，许多大事都只能进行试点。

不过，日本人民政府暂时没有搞出什么大的失误，也没有拖后腿的和大规模叛逃的。而在农村，整风运动也进行的相当顺利，没有出现大规模混乱和反抗，日共的干部很好的阻挡了运动扩大化和极端化，通过和平手段撤换了20%的农村干部，还对其中的部分腐败分子进行了公审。

不少腐败分子在公审大会上就完全失去了抵抗心理，开始各种求饶，可是群众和日共都不想饶了他们，下面“杀了他们”“别跟他们废话”的吼声越来越大，不少人已经屁滚尿流。

李平冈鄙夷地看着这帮家伙，顺带着踢了一个正在地上瑟瑟发抖的，贪污数额相当不小的中农（通过贪污达到了富农水平）村干部屁股一脚：“嘿，当初贪污的勇气哪里去啦？”

而每当几个腐败分子试图反驳的时候，日共的党员们就会拿出证据，把他们的嘴堵上。这时候，下面就会爆发出一阵阵“臭！臭！臭！”（等同于我国的“呸”）的喊声。许多腐败分子被枪决，还有部分被重重罚了一笔。

在富山被日共控制之后，日本当局气急败坏，立刻调动了富山静冈前线的一个师团乘坐火车前往加贺市，而当面的日本人民解放军则诡异的没有任何动作。尽管日军关东方面军的司令田中义一满脑子问号，他仍然不敢违抗军令，只好把部队进一步收缩。

日本人民解放军则顺势控制了几个有利地形，然后坐下来和日军对峙，并没有进行任何攻势。

6月20日，日军在提心吊胆当中进入富山市。令他们惊奇的是，市民中的相当一部分已经跟着日共溜了号——因为日共保证给每个人分发粮食，城内至少少了12%的人口。但是，城内损坏于战火当中的民房已经被基本清理了一次，不少废墟已经被彻底变成了平地。不管怎么说，日军还是把富山市攻克了，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进军高山市和飞驒市。

但是日共当然不肯让他们如愿以偿，放弃富山只是一时之举，相反对于建设已经初步走上正轨的根据地他们是要尽全力维护的。6月21日，日军进入岐阜县北部的山区，然后立刻陷入处处挨打的处境。许多山口，日共已经

修好了工事和坑道等待日军进攻。至于小路绕过，日共表示我们的村干部已经把小道都上报了，埋好了地雷，还有预备队等着你们过来。

6月22日到7月1日，日军发动了多次对岐阜县北部山区的渗透攻势，但是均被阻挡，不能推进。7月1日，日军不得不终止对岐阜北部山区发起的“送人头”行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日军都未能集中足够的兵力在日本人民政府控制区沿线发动大规模攻势，双方进入短暂的相持阶段。

双方都清楚，这是日本当局和日共方面蓄力的时间，下一次攻势将会变得更加激烈。但是这次修整，正好给了日共整顿农村生产，加快整合红区工农业的喘息时机。日共随即将在农村的士兵投入到农业生产当中，帮助农民施肥，小规模建设水利，同时帮助群众解决一些小事。部分战士对此颇有怨言，但是在教育下大多改正了错误。这样一来，日本人民解放军真正有了人民军队的气质，同群众的联系更加紧密了。

至于没改正的，那不好意思，军队已经把你开除了。

8月20日前后，关东地区的作物开始收获，日本人民政府随即发动全力，调动了相当一部分的党员和工人自卫队下乡帮忙，尽快帮助群众收获。在前所未有的“政府帮忙收获”和地主被打倒，自己为了自己工作的激励下，关东的群众展开了极高效率的收获。

为了鼓励群众，日共专门在东京附近用一些收割用的机器，用两天收获完了一百亩的土地，以此同群众进行对比。而群众的积极性令日共自己都被惊吓到了——第一天上午，群众还没有对自己的效率有概念，收获相对慢了一些。吃完午饭，他们看到自己已经完成了好大一块地，一下子兴奋起来了，加快了速度。结果，太阳还没下山，六百多个群众已经把一百亩的土地收割完了。

日共随即把这次群众胜利的消息对红区的广大群众大肆宣传，并且适时提出了“组织起来，群众胜过机器”的口号。在这个口号的鼓舞下，关东地区的收获异常迅速，从8月20日开始，到8月25日已经接近了尾声。这时，日共再推行合作社，广大群众都认识到了好处，纷纷建立合作社。

鸭川市的淳朴农民松下仁，背着一大袋粮食瑟瑟缩缩地走进了千叶市的市区。

日共特地在各个村庄都发布了公告，希望有闲暇的部分农民到附近的城市参与集会，出售粮食，还有看看有没有什么赚取外快的机会。正好这一年年景并不算差，日共又实行了空前的仁政——一成税，各地农民感恩戴德，便纷纷听从日共的建议，来附近的大城市转一转。

于是，活了三十多岁，只去过鸭川市和馆山市的松下仁，就被千叶市熙

熙攘攘的人流震惊了。好一会，他才回过神来，挤到一块贴着市区地图的公告板前找到了自己该去的地方，然后一头钻进人山人海当中去了。

按着路标转了大约一小时，松下仁终于找到了专门负责在粮价低的时候高价买粮，高价时低于市价卖出的平价社，把背了几十公里的粮食卖了个较好的价钱，高高兴兴地拿着换得的粮票和从工作人员手中拿到千叶的市地图，准备在千叶市转一圈。[1]

此时千叶市区已经人满为患，处处是来城里转悠的农民和千叶县下辖各市的市民为了应付这远超出原估计的人群，千叶市市委已经焦头烂额。许多重点地带民兵严重不足，几乎被人海淹没。

松下仁随着人群挤来挤去，一直窜到市中心的一处空旷地带，看见有一处戏台，上面挂着“新戏演出”之类横幅，便同人群一齐立定，准备看到底有什么戏看。这要演戏的人一开始见到人山人海有些怯场，可是又怕挨责备，便硬着头皮上了场。

这个组建戏团，排练戏剧的主意，是片山潜看了一些关于解放战争时期戏剧作用的文章以后出的。他迅速组织一部分党员开始着手改编《白毛女》。后来，又把李平冈也拉来，让他负责删去了一些中国背景的剧情，添加了日本本土的唱词和剧情。这样一番折腾之后，《白毛女》魔改版就登上了日本人民政府控制区的各大戏台。

而魔改版本的《白毛女》在松下仁和台下的观众看来，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农民的血泪史。

一开始，宫本父女两人勉强维持着家庭的运作，而小地主寺内定看中了宫本洋子的美貌，不断试图染指。宫本老爹和洋子都不大情愿，一直拒绝。恼羞成怒的寺内定勾结官府，把宫本家弄得负债累累，逼得父女二人逃往北海道。看到这里，有不少农民都叹息起来，但又希望父女在北海道能够平安生活下去。

然而，传说中的肥沃的北海道，其实相当难以开垦，一年到头剩不下多少粮食的，宫本老爹在被税吏抢走大半粮食后病死，洋子在负债累累的情况下连夜逃离北海道，但举目无亲，只好再次回到本村。寺内定喜出望外，把洋子当做玩具折腾，不堪受辱的洋子逃入大山靠挖野菜过活。之后的剧情同白毛女原剧相差无几，感染力同原版也一般无二，农民和许多市民都落下泪来，全场鸦雀无声。最后，当村民在游击队的支持下同洋子一道公审寺内定时。台下发出阵阵欢呼声，观众们顾不得擦眼泪，反倒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的演员，竖起耳朵听对话。

当游击队长作出判处寺内定死刑的决定时，不知谁喊了一声“杀得好!”

[1] 日共采取了粮本位制度并以粮票暂代钞票作一般等价物，强行定一升米价为一角但不强迫兑换日本帝国纸币。这是过渡时期的措施。

全场观众热烈地跟着喊起来。演出就在一片雷鸣般的掌声中结束了。

吃过午饭，松下仁在市场里转了一圈, 又在供应布料的合作社销售点转了一圈，拎着一袋杂七杂八的东西往城北走。他听市场的人说，各县的军火厂在城北搞了个比赛。测试哪个厂造的更好。松下仁好奇心大起，便按地图往那个测试场走。

也难怪，即使是已经开了几十年的国门，广大底层群众的娱乐活动还不太多，自然对这些活动感兴趣，以至于几千人涌来围观，将三个方向的路都挤满了。

未进测试场，已经听见了一阵阵喧哗。各地都有群众，赶来围观加油打气，喊声此起彼伏，松下仁来的晚了，不得不站在远处的几个房子上和一群农民挤着围观。此时场内已高高挂起多个牌子，报告各县制作的手榴弹，子弹的威力和得分。

六本木区的子弹分和横滨市的子弹分遥遥领先，但岐阜市和妙高市的子弹分也不低。尽管千叶市的得分接近垫底，广大群众并未表露出不满，反倒是满脸期待着其他地方的成绩。

也难怪，即使是已经开了几十年的国门，广大底层群众的娱乐活动还不太多，自然对这些活动感兴趣，以至于几千人涌来围观，将三个方向的路都挤满了。

此时，富士市派来的一名士兵掷弹手刚刚将手榴弹丢到爆炸圈内，由人记录造成的伤害。这士兵仿佛有点尴尬，便挠挠头，“呼”地出了一口气，在掌声中往本市代表的席位上走去。

在足立区军火合作社作为最后一队测分之后，人民军工委员会宣布岐阜市军火合作社得到冠军，横滨市的军火厂得到亚军，六本木区的军火厂夺得季军，然后颁奖结束了此次比赛。

（未完待续）



5—6月国际新闻速览



敬请关注：
知乎：国际红色通讯
微博：国际红色通讯3rd
微信：rednews2017
网站：irn.red
邮箱：irnchina@gmail.com
本信息更新于2020年1月



转载自 国际红色通讯
详细内容见原作者

印度人民党趁疫情大开倒车

industriall-union.org. 2019/5/14

印度部分邦政府借疫情蔓延之机，在劳工权益问题上大开倒车。这些邦的执政党，均为中央政府的执政党印度人民党。他们未经议会开会，就肆意修改劳动法规，延长劳动时间。

北方邦、古吉拉特邦、中央邦和喜马偕尔邦的邦政府下令将工作日延长至12小时，将工作周延长至72小时。

北方邦政府暂停了38部劳动法规中的35部，暂停时间长达3年。



古吉拉特邦政府下令，新的工业部门在1200天内不受最低工资法案、工业安全规章、雇员补偿法案（Minimum Wages Act, Industrial Safety Rules and The Employee Compensation Act）之外的其他劳动法规的约束。

中央邦政府下令，在未来1000天内，为企业免除包括工厂法案、工业关系法案、工业纠纷法案和劳动合同法案（Factories Act, Industrial Relations Act, Industrial Disputes Act and the Contract Labour Act）在内的劳动法规所规定的义务；对纺织、皮革、水泥、钢铁、电气产品、电力、公共交通、工程、汽车等11个行业，无限期地免除《中央邦劳资关系法案》（Madhya Pradesh Industrial Relations Act）所规定的义务；对雇员少于50人的企业不进行常规检查或突击检查。

拉贾斯坦邦、特里普拉邦和旁遮普邦也增加了工作时间，并为企业免除了劳动法规所规定的部分义务。

土耳其资本家协会提议建立“劳动营”

《左翼报》［土耳其］**2020/5/14**

土耳其的亲政府伊斯兰资本家组织——工业家与商人独立协会（Independent Industrialists’ and Businessmen’s Association）提议，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与外界隔离的“劳动营”（labour camps），以免生产受到新冠疫情影响。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该协会已将其7年前启动的一个“中型工业区”转变为“隔离生产基地”。该“隔离生产基地”可容纳1000个家庭，约4500人，并获得了工业技术部和环境与城市化部的必要许可。

当局计划在全国建立4个主要的生产基地。第一个基地将于2020年6月15日在土耳其西北部的泰基尔达省（Tekirdağ）投入使用。后面3个基地将分别建立在伊斯坦布尔的Hadımköy区、南部的哈塔伊省（Hatay）的Hassa区以及北部的黑海地区。

土耳其共产党主办的《左翼报》（Sol）发表评论称，工业家与商人独立协会企图将疫情危机转变成资本家阶级建立“劳动营”的机会，为进一步剥削工人铺平道路，即便是在疫情爆发和不安全的劳动条件下。

以色列议会外千人集会，抗议新政府上任

以色列共产党网站 **2020/5/16**

5月14日晚上，来自各反对派组织的大约1000名公民在位于耶路撒冷的以色列议会外集会，抗议内亚尼亚胡和甘茨的联合政府上任。

示威者中间包括以色列共产党与“和平与平等民主阵线”的数十名成员。以色列共产党与“和平与平等民主阵线”（译注：以共领导下的政治组织）主要抗议的是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以及内塔尼亚胡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和社会政策。

由于甘茨为首的蓝白联盟与内塔尼亚胡为首的利库德集团之间的分赃问题，新政府的就任仪式被推迟到5月17日举行。受新冠疫情影响，以色列的失业率已飙升至25%。

“欧洲共产党倡议”召开电话会议

欧洲共产党倡议网站 **2020/5/11**

2020年5月10日，“欧洲共产党倡议”（European Communist Initiative）召开了电话会议，主题为“共产党和工人党在疫情和资本主义新危机的条件下的斗争”。

参加会议的包括来自奥地利、保加利亚、法国、丹麦、希腊、意大利、爱尔兰、西班牙、克罗地亚、拉脱维亚、白俄罗斯、立陶宛、马耳他、挪威、匈牙利、乌克兰、波兰、俄罗斯、塞尔维亚、瑞典和土耳其的24个成员党。

希腊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里斯·库楚巴斯做了介绍性发言。

会议主要就以下问题进行了交流：

1）缅怀工人斗争以及红军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人民反法西斯斗争中牺牲的烈士们；

2）新冠疫情暴露出了资本主义国家公共卫生系统的巨大问题，这些问题是由长期以来的反人民政策导致的。

3）在资本主义新的危机形势下，资产阶级将加强对工人阶级的进攻。共产党和工人党应领导反对资本进攻的斗争。

会议认为，"社会主义还是野蛮"这一口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适时。

追随皮诺切特脚步的智利右翼：对胡戈•古铁雷斯的反民主迫害

《保卫共产主义》[希腊] 2020/5/25

法西斯独裁者皮诺切特（Pinochet）已经离去，但他的徒子徒孙——智利右翼正沿着他的脚步前进。




★智利右翼总统塞瓦斯蒂安·皮涅拉（左）（Sebastian Pinera）、共产党议员胡戈·古铁雷斯（右）（Hugo Gutiérrez）。

在2019年10月对人民抗议进行极端和暴力的镇压之后，塞瓦斯蒂安·皮涅拉的反动政府及其政治盟友加强了反共主义和对人民民主权利的攻击。

这些攻击以智利共产党及其活动为目标。更具体地说，在过去几个月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正试图将议员、智利共产党副主席乌戈·古铁雷斯撤职。

在2020年5月17日发表的一份声明中，智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指出：

"反动右派正试图从议会中驱逐共产党副主席乌戈·古铁雷斯。右派已就此事向宪法法院提出上诉。宪法法院是目前政治体制的一部分，声誉极度败坏，既缺乏公众合法性，也不具有民主代表性。

胡戈·古铁雷斯副主席很早就参与捍卫人权的斗争——从反对皮诺切特独裁统治开始，经过20世纪90年代，直到今天。

他也是争取新政治宪法、立宪会议的和基于人民主权的斗争的发起人之一。他一直在推动有利于人民、人民主权和他所代表地区的立法倡议。

这种迫害图谋的真正原因是，（智利右翼）要剥夺智利人民为捍卫自身利益而采取行动的权利。我们发出警告，这一右翼行动是独裁计划的一部分；



更广泛的、倒退的、反动的右翼计划和右翼政府正试图进一步压缩智利仅存的民主空间。

胡戈·古铁雷斯依靠他的党和智利人民来对付这一不民主和虚伪的行动。”

皮涅拉政府及其右翼盟友利用共产党副主席胡戈·古铁雷斯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段幽默短剧，作为将他撤职的借口。

智利和拉丁美洲的进步政治力量，以及全世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都谴责对古铁雷斯的反民主迫害。

希腊共青团和工会示威声援美国人民

SolidNet 2020/6/2、12

6月1日，希腊共青团（KNE）的成员在美国驻希腊大使馆门前举行示威，打出了“资本主义意味着’我无法呼吸’”（Capitalism means, -I can’t breathe-）的标语。



★希腊共青团6月1日的示威

6月11日，希腊全体工人战斗阵线（PAME）领导雅典等多座城市的成千上万名工人举行抗议，反对“造成贫困和失业、战争和难民、种族主义及各种歧视的制度”。在雅典，游行队伍在希腊议会外的宪法广场集结，并向美国大使馆进发。



★希腊全体工人战斗阵线6月11日的示威

希腊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库楚巴斯说，“我们游行至美国大使馆，表达我们对美国人民的声援。他们正在为反对表现了资本主义的全部野蛮、种族主义、恐怖主义和压迫的政府——特朗普政府——而斗争。”

法国雷诺汽车工人抗议关厂裁员

《晨星报》［英国］2020/5/29

5月29日，工会成员们在巴黎郊区的雷诺工厂外聚集，打出“反对关停工厂”的标语。工会方面称，雷诺汽车计划关停法国工厂，并在全球裁减1.5万人，其中4600人在法国。对此，雷诺汽车董事长斯奈德（Jean-Dominique Sneard）承诺不会非法裁员，并称已与工会开始谈判。

就在几天前，法国政府出台了汽车行业救助计划，来鼓励法国汽车公司继续在本国生产。而法国总工会（CGT）雷诺汽车工厂的代表法比恩·加切（Fabien Gache）表示，该项裁员计划可能影响工厂的长期发展，明确显示



出“降低法国汽车生产能力的意图”。这项裁员计划还将导致雷诺产业链上游的供应商和设备制造商进行更多的裁员。

哥伦比亚工人抗议政府侵害工人权益

《晨星报》[英国] 2020/6/12

6月11日，哥伦比亚几个主要工会——工人团结中央工会（Unitary Central of Workers, CUT）、工人联盟（Confederation of Colombian Workers, CTC）和劳工总联盟（General Confederation of Labour, CGT）举行了联合示威，反对政府纵容大公司随意取消工人保障和削减工时的行为。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哥伦比亚总统伊万·杜克·马尔克斯以“稳定经济”为借口，宣布削减养老金、医疗和安全支出，允许大公司在工时等方面“灵活经营”。工会以“反饥饿”为口号，要求保障工人用于购买食物的基本收入和足够的医疗保障。

非裔和原住民领导人联署的一份声明则呼吁实现社区和平。在疫情隔离期间，平均每三天就有一名社会群体领导人被暗杀。截至5月底，今年已经发生了183起针对政治人物的暴力事件。代表30个全国工人组织的小组声明称，哥伦比亚目前面临的巨大灾难，与其说是因为新冠肺炎大流行，不如说是因为杜克总统的政策，让银行家、垄断企业和大地产者受益，而让人民付出了更多的牺牲。

黎巴嫩真主党的支持者与抗议人群发生冲突

《晨星报》[英国] 2020/6/7



★贝鲁特烈士广场的抗议集会

6月6日，数百人在贝鲁特街头集会，抗议黎巴嫩政府的紧缩政策，要求黎政府保障民众的医疗、教育、就业等基本权利。抗议者与真主党的支持者遭遇并发生暴力冲突，共造成48人受伤。黎安全部队在冲突双方之间发射了催泪瓦斯。

今年，黎巴嫩的经济危机日益加深，出现了债务违约，失业率上升到35%，接近一半人生活在贫困中，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乞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黎巴嫩全国进入封锁状态，采取了紧缩的财政政策，大量削减了社会保障开支。

土耳其当局拒绝释放两名人民民主党议员

《晨星报》［英国］2020/6/10

5月4日，三名土耳其议会议员被剥夺了席位，其中共和人民党议员伯贝罗格鲁（Berberoglu）是因向媒体泄露土耳其向叙利亚恐怖组织运送武器，人民民主党*议员莱拉·古文（Leyla Guven）和法里索格拉里（Farisoglullari）被指控与被取缔的库尔德工人党有联系。



★被剥夺议会席位的人民民主党议员莱拉·古文。因批评土耳其非法入侵和占领叙利亚北部的军事行动，她曾于2018年1月被拘捕。在狱中她领导7000名囚犯绝食抗议，要求改善被监禁的库尔德工人党（PKK）领导人奥贾兰的糟糕待遇。

6月初，共和人民党议员伯贝罗格鲁因“入狱可能感染新冠肺炎”而被释放，但与其同时被捕的两名人民民主党议员却没有被释放。这遭到了土耳其许多社会组织的谴责。

之前，在遭到国际国内对其防疫工作的批评后，土耳其政府曾特赦大量在押人员以减少监狱传播风险。5月，该国30万在押人员中有约10万人获释，甚至包括强奸犯、恋童癖者和有性暴力前科的人，但那些被污蔑为“恐怖分子”的政治犯则不在此列。

罗贾瓦群众谴责土耳其占领者虐待当地妇女

《晨星报》［英国］2020/6/9

* 译者注：人民民主党（HDP），土耳其国内部分左翼团体和库尔德裔组成的政党，因其社会主义、世俗主义、民族和解的观点而在议会中一度占据重要地位。2016年，正义与发展党操纵立法，废除了议员的诉讼豁免权，并在此后以莫须有的“参与恐怖主义活动”逮捕了大量人民民主党议员。2015年以来该党有1.5万名支持者被拘留，6000人被判刑，200名民选官员和9名议员仍在狱中。



6月9日，在叙利亚北部罗贾瓦的阿夫林，成千上万人走上街头，要求为被关押在土耳其集中营里饱受折磨的妇女伸张正义，呼吁国际社会“听一听阿夫林女性的惨叫”。多个人权和妇女组织也已经发声，认为国际机构的视而不见和不作为助长了土耳其方面的暴行。

近来，大量库尔德和雅兹迪妇女被土耳其政府豢养的民兵“哈姆扎师”（Hamza Division）绑架，关押在集中营里。这些妇女饱受折磨，有些被剥光衣服，遭受强奸和性虐待，这些过程被上传到一些社交软件上。土耳其政府最近致力于改变占领区的人口结构，妇女尤其成为了这一政策的牺牲品。最近，阿夫林还发生了几起土耳其支持者发起的、针对未成年女性的绑架和虐杀。

印共（马）谴责莫迪政府取消食品价格限制

《晨星报》［英国］2020/6/5

印度政府最近修改了《商品基本法》，取消了对主要食品价格的价格限制，这为投机行为和囤积居奇铺平了道路，对印度的粮食安全造成了进一步的不利影响。

6月4日，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谴责了这一改革，并警告称，这项改革使得大宗商品的远期投机成为可能，并使得跨国资本巨头进一步进入印度农业。他们警告说：“莫迪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将使得压榨农民和消费者的大食品企业牟得暴利，甚至让印度农民回想起英国殖民统治下残酷的日子。”



★印度孟买的一个男孩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援美国人民的联合声明

SolidNet

国际红色通讯 译

由加拿大共产党、美国共产党和墨西哥共产党发起，2020 年 6 月 9 日

美国多民族的工人阶级和北美人民已经走上街头动员起来反对种族主义、镇压、失业和其他由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引起的严重问题，我们——（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对他们表示声援。

（警察）谋杀乔治·弗洛伊德（GeorgeFloyd）不是个例，这是针对非裔美国人、拉丁裔和其他民族移民的种族歧视政策。剥削制度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整个工人阶级，正如新冠肺炎疫情所证明的那样——目前，（美国）感染人数已经超过200万，死亡人数接近113000；本来我们可以挽救许多生命，但私有化的医疗保健制度（在实践中）被证明是危险的，因为它的准则是资本主义利润。

贫困、失业、对工人权利的攻击、反移民政策、警察暴力、对其他民族的帝国主义侵略、毒品和犯罪对社会的破坏，证明了资本主义就是野蛮主义，而社会主义是现实和必要的。

我们共产党和工人党表示：

-我们谴责对乔治·弗洛伊德、抗议者和特朗普当局镇压政策下的受害者的种族主义谋杀。

-我们声援美国各城市抗议种族主义和压迫的工人和人民。

-我们声援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的美国工人和人民。

-我们谴责现在主政白宫的特朗普当局，他们煽动种族主义、反移民、仇外和反共的运动。我们谴责宵禁和国民警卫队，谴责对为变革而战斗的人们的逮捕和谋杀。

你站在哪一边？共产党和工人党与美国工人和人民站在一起，反对资本主义及其野蛮主义！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签署本联合声明的政党（SolidNet）：

1、阿尔巴尼亚共产党
2、阿根廷共产党
3、澳大利亚共产党
4、奥地利共产党
5、奥地利劳动党
6、比利时共产党
7、玻利维亚共产党
8、巴西的共产党
9、加拿大共产党
10、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
11、智利共产党
12、人民先锋党（哥斯达黎加）
13、丹麦国内共产党
14、多米尼加共和国革命力量
15、芬兰共产党
16、法国共产党
17、萨尔瓦多共产党
18、希腊共产党
19、伊朗人民党
20、伊拉克共产党
21、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共产党
22、爱尔兰共产党
23、爱尔兰工人党
24、共产党（意大利）
25、意大利重建共产党
26、约旦共产党
27、卢森堡共产党
28、墨西哥共产党
29、墨西哥人民社会党
30、墨西哥人民社会党（全国政治集团）
31、巴勒斯坦人民党
32、秘鲁共产党
33、巴拉圭共产党
34、菲律宾共产党（PKP-1930）
35、葡萄牙共产党
36、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党
37、俄罗斯联邦共产党
38、加泰罗尼亚共产党
39、西班牙工人共产党
40、苏丹共产党
41、斯威士兰共产党
42、土耳其共产党
43、美国共产党
44、委内瑞拉共产党

其他政党：

1、加利西亚人民联盟
2、美国共产党人党

本联合声明开放签署中。

关于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持久人民战争的问题

何塞·马利亚·西松
国际红色通讯 译

译者按 1938 年，毛主席曾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写道，“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准备最后地推翻资本主义。在那里，是长期的合法斗争，是利用议会讲坛，是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不到资产阶级处于真正无能之时，不到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有了武装起义和进行战争的决心之时，不到农民群众已经自愿援助无产阶级之时，起义和战争是不应该举行的。”

毛主席当时重申了列宁关于俄国十月革命普遍意义的论断，认为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道路在于长期的群众工作和危机时期的武装起义。同时，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又以自身实践丰富了马列主义的革命学说，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俄国革命的新路，即持久人民战争的道路。

在今天的国际毛主义运动中，对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道路存在着重大分歧。一派以菲律宾共产党为代表，认为持久人民战争的战略只适合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道路仍然是长期群众工作基础上的、危机时期发动的武装起义；另一派以挪威“为人民服务-共产主义联盟”等一系列发达国家的毛主义组织为代表，认为持久人民战争道路具有普适性，不仅适用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而且适用于帝国主义国家。前者认为后者是“左”倾机会主义，称其迟迟不能发动的“持久人民战争”已沦为空谈；后者则批判前者为右倾机会主义，称其“持续积蓄力量”是滑向改良主义的骗局。

对于国际毛主义运动中的这一争论，我们认为应当予以关注和研究。我们翻译了菲共网站（cpp.ph）2019 年 6 月 5 日发表的其主要创始人何塞·马利亚·西松（Jose Maria Sison）的文章，供读者朋友参考。同时我们也看到，国内早有同志关注到了这一争论，并翻译了挪威“为人民服务-共产主义联盟”对此文的批判文章《捍卫和应用持久人民战争的普适性！》（https://mp.weixin.qq.com/s/KmY0RvzBqXB2sNDUKD8p8A），建议感兴趣的读者一并阅读。

此外，目前未见印度共产党（毛主义）对这一争论的表态。如有读者朋友了解，可告知我们，便于我们进一步研究和介绍。

自称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人曾多次问我，在工业无产阶级已成为多数阶级而农民已成为少数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能否像毛泽东在中国那样，成功地进行持久人民战争？

我将尝试在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基础上，在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现存的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以理论和假设的方法来答这个问题。在此过程中，我

将纠正一些人的观点，即认为毛的持久人民战争理论是普遍有效和适用的观点。

中国和菲律宾的持久人民战争

毛本人曾解释说，对于处于长期危机中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要成功地进行人民民主革命，持久人民战争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

通过运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路线，无产阶级革命者可以利用农村作为广大的机动空间，并获得作为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群众的支持，从而带领人民军队逐步从弱小走向强大。



★年轻的新人民军战士们。1942年，菲律宾共产党组织了抗日人民军（也称为虎克军），1950年将其改名为人民解放军。上世纪五十年代，人民解放军严重受挫，重建后的菲律宾共产党整顿老人民军战士，成立新人民军，进行游击战以追求“新民主主义”。

因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很长时期内利用农村积累足够的武装力量和政治力量，最终夺取城市，取得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人民斗争的胜利。

在论述菲律宾武装革命的特殊条件的著作中，我坚持了毛的持久人民战争的理论和实践。此外，我还考虑了菲律宾的群岛和山区的地理特征。

50多年来，尽管美国和菲律宾伪政权为粉碎菲律宾武装革命而采取了各种战略计划，尽管世界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例如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全面复辟以及苏联的垮台——但是通过实行持久人民战争的战略路线，菲律宾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革命得以延续并发展壮大。

对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在农村以一支弱小的人民军队开始武装革命，并利用广阔的空间和漫长的时间来维持这一战争，是不可能的。

一旦这支军队敢于发动第一次战术进攻，垄断资产阶级的庞大军队以及高度统一的经济、通讯和运输系统就会把它压倒。

当然，在工业资本主义国家，“人民战争”一词可以被灵活地用来表示人民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所必需的武装革命。但是毫无疑问，真正应当“持久”的，是为群众普遍参与的武装革命而做的准备工作。

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遭到危机的沉重打击，以致统治阶级不能以旧的方式统治下去，人民渴望革命变革，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强大到足以领导革命的条件下，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在没有审慎地考虑革命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的情况下，在城市或农村发动武装革命是徒劳的。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武装起义，只有在国家因

为国内危机、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卷入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战争而遭到严重削弱，以及革命群众运动兴起并拥有足够武装力量的条件下，才能取得胜利。

无产阶级武装革命的历史例证

1871年的巴黎公社表明，当法国专注于普法战争，城市武装卫队在无产阶级群众的压倒性支持下发动起义时，无产阶级革命者就可能取得城市武装起义的胜利。

在帝国主义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则更具有远见卓识，将自己的干部派遣到沙皇军队中，使之成为革命的种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士兵群众变得跟人民群众同样不满时，他们起来推翻了沙皇，之后又推翻了克伦斯基的资产阶级政府。之后，在俄罗斯帝国的广阔农村，布尔什维克取得了反对反动派和外国干涉者的战争的胜利。

德国法西斯，早在得到垄断资产阶级支持从而统治德国，并直接使用国家恐怖主义来镇压无产阶级及其革命政党之前，就成立了自己的武装团体或准军事组织，并在镇压工人罢工和人民抗议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和警察合作。

在魏玛共和国遭受严重危机期间，德国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也拥有自己的武装团体，但却在紧要关头被法西斯镇压。然而，其教训仍然有效——在武装革命的准备和实行过程中，无产阶级革命者和人民都必须尽力做好和取得胜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游击队员在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兴起，进行反对法西斯的游击战。在1922年法西斯首次执政的地方（意大利），共产党人和人民在城市和农村进行游击战，直到吊死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几乎能够夺取国家政权。

根据上述历史事实，组织起来的革命无产阶级和群众应当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发生危机的倾向，在危机到来时，垄断资产阶级会诉诸法西斯主义以阻止无产阶级革命。尽管资本主义中已经存在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无产阶级也必须首先击败法西斯主义，在社会主义胜利前首先要赢得争取民主的战斗。

无产阶级革命者武装自己，有意识地接受纪律约束并进行军事政治训练，为将来的武装冲突做准备是合乎逻辑的，也是必要的。我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武装能力首先受到意识形态、政治、组织原则和规则的约束。

正如布尔什维克党那样，无产阶级革命者也可以派遣干部到反动军队中去做革命工作，特别是因为大多数士兵来自工人阶级。未来的资本主义国家可能因为危机和战争而被虚弱，以至于其反动武装趋于瓦解，就像第一次世

界大战中的沙俄军队一样。

在秘密获得和保存武器长达数十年，并在最受限制和最困难的条件下发动小规模进攻的问题上，爱尔兰和巴勒斯坦的革命武装组织做出了榜样。由于得到了反对占领军的全部基层群众支持，这些革命战士得以自觉遵守纪律，技能熟练，足智多谋，坚忍不拔。然而，他们的处境与发展进程在当今资本主义国家并不典型。

关于武装无产阶级的思考

根据那些伪装成自由民主的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现行宪法和法律标准，任何个人都可能合法地获取枪支，用于体育目的或面对犯罪分子时的自卫目的，以及反抗国家实行暴政和压迫的潜在可能的目的。

在美国，尽管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大声疾呼要求实行更严格的枪支许可法案，解除白人至上主义者和极端圣战分子的武装，并将武器限制在儿童可接触范围之外（儿童是最先受到帝国主义的美国文化和潜移默化的暴力的影响的群体）；但是为了维持国内广大的销售市场，武器制造商仍然主张公民持有武器的宪法权利。

许多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允许公民保存他们在国家支持的军事训练中获得的枪支。而且，这些国家不存在极少数美国疯人或儿童从家庭枪械库中取出枪支，在学校或其他公共场所射击并杀死无辜者的问题。

因此，我们或许可以用射击运动俱乐部、社区自卫组织或公共活动和建筑的志愿安保队伍的形式，把持有枪支的无产者组织起来。当然，让人民的武装团体四处显摆，同时挑衅地宣布自己反对资本主义国家及其军队和警察，是极不明智的。

这种轻率的举动会立即招致国家采取暴力措施进行镇压，就像历史上的黑豹党（Black Panthers）一样。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公开炫耀自己的武器和军事训练，是法西斯主义者和其他反动武装团体才享有的特权。

将武器带入本是合法而且和平的群众抗议活动中也是不明智的，那里的大多数人都没有武装，还远远没有准备好发动武装起义。在武装革命的条件成熟之前，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不公开宣布建立人民军队的意图，是明智的选择。

无论当地实行什么样的枪支许可法案，无论其法律规定有多么严苛，在人民中间也一定存在掌握技能、资源和设备的人，他们可以在自己的私人车库和工作棚中小心地制造枪支。在为反对法西斯主义者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战争做准备的长期工作中，人民可以获得并制造枪支。

在一个特定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果尚不存在拿起武器进行斗争的条件，无产阶级革命者就应当继续以合法和令人信服的方式激励、组织和动员群

众，同时应当确保在必要时具备一定手段反对法西斯分子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自卫战斗并取得胜利。

要使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真正具有革命性，完成意识形态、政治和组织方面的任务远比获取或制造枪支重要。当然，更重要的是在法西斯上台之前拥有枪支，而不是在法西斯准备夺取政权时什么武器都没有。

为了强调起见，这里再讲一遍，即便在美国，宪法也规定人民享有拥有枪支以阻止国家垄断武器的权利，也就是允许公民拥有用于反对和推翻暴政和压迫性政府的武器。此外，还有许多允许公民持有武器的合法理由。

日益恶化的全球条件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在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和解体之后，美帝国主义在单极世界内享有唯一的超级大国地位，并以野蛮的、侵略性的方式来推行其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和新保守主义的军事政策。然而，在不知不觉中，这也破坏了美国自身的实力并加速了其战略上的衰退。现在，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尊崇贸易保护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鲁莽好战。

自2008年危机以来，尽管美国变得越来越喜欢耀武扬威，但是它战略上的衰退在经济和金融领域已变得显而易见。中国和俄罗斯作为新帝国主义大国的崛起加剧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并在一个明显的多极化世界中加剧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帝国主义势力总是试图将危机的重担转移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身上，他们因此而遭受变本加厉的压迫和剥削，最终被迫奋起抵抗。帝国主义者总有一天会迫使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和群众实行武装革命。目前，帝国主义国家正变得更加具有压迫性，并且也在产生法西斯主义运动。

尽管目前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者都没有面临立即发动武装革命的需要，但他们也可以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团结精神，与欠发达国家正在准备和已发动武装革命的无产者和人民分享他们的革命思想、经验和技术，包括使用武器和制作武器的技能。

人民战争在世界上的欠发达国家或农村地区的扩散和发展，将会有助于资本主义国家武装革命的兴起。而目前，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大国正在欠发达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和侵略战争。因此，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反帝国主义团结的一切具体行动，都是迫切需要的。

补充说明：

（对持久人民战争）教条地加以主张，或是将我文中的每一部分内容剥

离于它的清晰背景，并不足以在任何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发动持久人民战争。

几十年来，我听到过不少在帝国主义国家发动持久人民战争的主张或威胁。但是直到今天，我还没有看到任何毛主义党宣布或实际在帝国主义国家开始了持久人民战争。

事实上，我不知道有哪个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毛主义党，强大到能够领导相当规模的工业和服务业无产阶级群众参与的武装革命。在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和工人合作社中，也没有哪个毛主义党像1917年十月革命前的布尔什维克党那样强大。

在所有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现在都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持久人民战争。一直以来“持久”的，只是关于发动持久人民战争的可能性的空谈和空话。（空谈者）却没有为之做任何严肃的准备。没有基于主客观条件的一定时期的准备，就不可能有这样的人民战争。至少需要一些年来准备，才可能开始这样的人民武装革命。

只有经过一个时期的意识形态工作、政治教育和群众工作，把党和群众组织起来，秘密地积累武器，进行政治军事训练，以及对反动武装部队进行布尔什维克式的渗透，才可能在工业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任何持续的和有规模的人民战争。这样的准备和意见不应被轻视或贬低。

要领导千百万人民进行武装革命，其准备工作应当利用的因素包括：帝国主义危机和战争，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分裂，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各反动部分之间的暴力矛盾，欠发达国家的革命进展，无产阶级和人民对革命的渴望，革命政党的力量。

只有“左”倾机会主义者、假冒的毛主义者甚至是那些潜伏于我们内部的密探，才会蔑视一直以来《共产党宣言》关于赢得反对资产阶级专政、争取民主的战斗的主张，才会不在上文提及的主观条件和有利客观条件方面做任何必要准备，而狂热地鼓吹在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人民战争。

赢得争取民主的战斗，并不意味着只在阶级专政的范围内与资产阶级竞争，而是以一切可能和必要的方式与垄断资产阶级的企图作斗争。垄断资产阶级企图将自己装扮成温和的中心，利用改良主义即社会民主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作为它的两翼，通过削弱和摧毁来阻止无产阶级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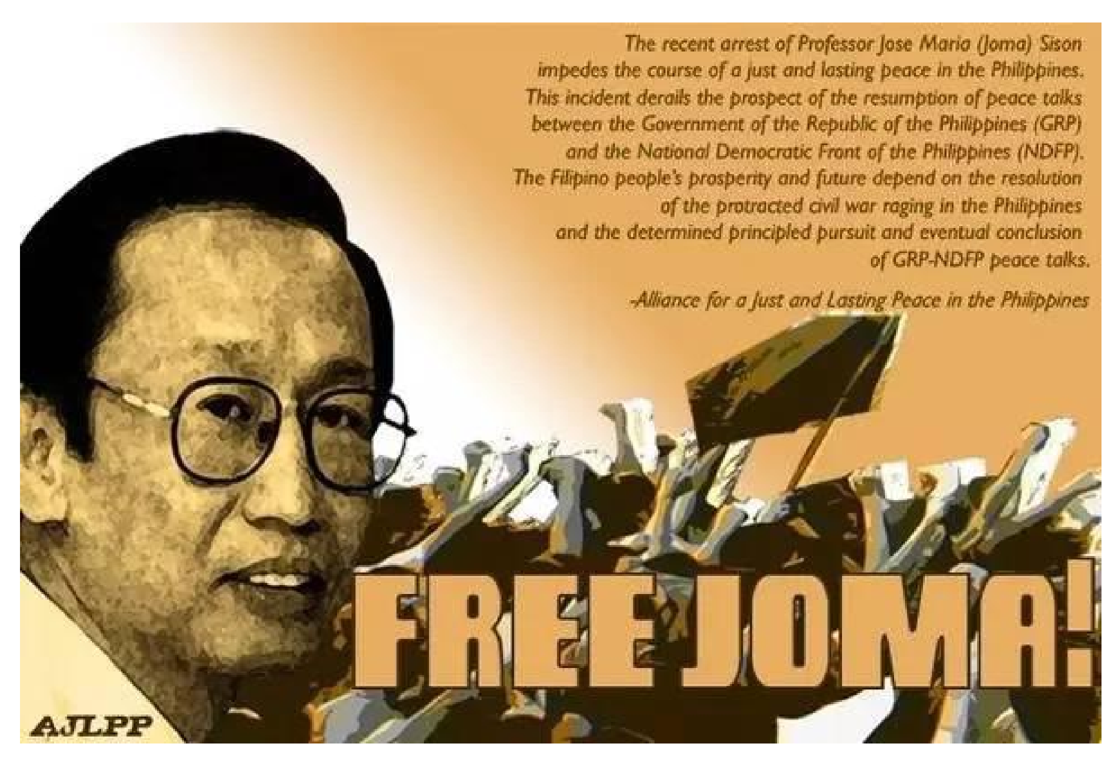
在任何国家，严肃的毛主义党都会为武装革命制定具体的计划和准备。菲律宾无产阶级革命者必须研究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推进人民民主革命的总路线和持久人民战争的战略路线，开展社会调查和群众工作，以发展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本国剥削阶级的人民革命斗争中的三大武器——党、人民军队和统一战线。

为了给重建菲律宾共产党（1968年12月26日）和新人民军（1969年3月29日）做准备，菲律宾无产阶级革命者花了整整十年时间来开展意识形态、



政治和组织工作，花了大约五年时间来进行政治军事训练，还与1950年至1952年间被击垮的老人民军的战士们建立了联系。

共产党人宣扬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和政治纲领，绝不隐瞒自己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并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的最终目标。但是他们很有头脑，既能运用公开和合法的斗争形式和方法，也能运用秘密和非法的斗争形式和方法，把革命群众斗争发展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他们也非常审慎，不会陷入“左”倾或右倾机会主义、假毛主义者和特工的陷阱中。



★何塞·马利亚·西松（Jose Maria Sison，1939—　　），菲律宾共产党（菲律宾语：Partido Komunista ng Pilipinas，缩写为CPP）建党主席，菲律宾民族民主阵线首席政治顾问和人民斗争国际联盟主席。1962年加入旧菲律宾共产党（菲律宾语：Partido Komunista ng Pilipinas，缩写为PKP），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化名为阿马多·格雷罗（Amado Guerrero，意为“亲爱的战士”）。1966年领导左派发动第一次大整风运动，批判旧菲共中央的路线错误。1968年重建菲共，并先后建立新人民军与菲律宾民族民主阵线，发动持久人民战争。1977年被马科斯独裁政府逮捕入狱，1986年马科斯垮台后被释，1987年被迫流亡荷兰。1992年发表《重申我们的基本原则并纠正错误》，发动第二次大整风运动，反思错误的政治路线，加强党的思想、政治、组织。2007年被荷兰政府以涉嫌参与暗杀逮捕，经多方声援解救，2008年被释放。代表作有《菲律宾社会与革命》。

历史转折中的巴枯宁：对巴枯宁主义的理论批判

十月烽火

巴枯宁反动谬论的主要内容

一、宣扬个人自由，鼓吹各“阶级的平等”

众所周知，根据历史唯物主义，人的解放，必须是从剥削的社会关系中获得解放，是整个社会各阶级的解放。而巴氏却鼓吹超阶级的个人“自由“，他站在（产生于资产阶级私有制的）人性论的立场上说“*人类进化的目标在于完成人性，只有当个人得到绝对自由时人性才能获得最完满的实现*”。在这里，巴氏把他所谓的自由和人性都说成是超阶级的存在。（社会科学里的人性是什么？当然是人的社会性，如果有人妄图把什么人的自然属性规律放到社会学上运用，那他就是不折不扣的蠢蛋）

真可笑，巴氏表面上叫喊着消灭资产阶级的权威统治，他的脑子里却满是资产阶级那一套狭隘的偏见。相信“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句话大多数人早已烂熟于心。人性（本文都指社会性）、道德，它们当然不例外，资产阶级人性论提出人性永恒自私，但完全不懂，人性的自私和败坏的道德是伴随着阶级社会一同产生的。

> 生产力的发展（剩余劳动出现，原始公社瓦解，向阶级社会的最初阶段-奴隶社会过渡）已经达到了使剥削劳动者成为可能的程度。”“原始公社的合作和团结关系让位给社会一部分人统治另一部分人的关系，让位给剥削，压迫和不可调和的仇恨的关系。社会分裂为对抗的阶级，即奴隶阶级和奴隶主阶级。[1]

> 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劣的吝啬利益掠夺公共福利的私利观念——揭开了新出世的文明的阶级的社会;最可鄙的手段——暴力、欺詐、背叛——的无阶级的氏族制度陷于损毁并且走到崩溃了。[2]

因为巴枯宁基于人性论偏见得出的人性是超阶级的概念，因此，他主张不分阶级的绝对自由平等，把“*一切阶级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平等*”作为奋斗目标。他在1868年9月的演说中说“*我不能想象在没有自由的情况下还会有人和属于人类的东西*”“*我希望个人之间和阶级之间都得到平等*”[3]。一边要保留现存的阶级，一边要在这个基础上实现“阶级之间”的“平等”，不得不说巴氏真是个梦想家！

马克思一针见血的指出：“‘各个阶级的平等’，如果照字面上的理解，不过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宣扬的‘资本和劳动的协调’的另一种说法而

[1] 《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第四章第四节。

[2] 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65 年，第 113 页。

[3] 巴枯宁《在和平和自由同盟 1868 年伯尔尼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已。”[4]

二、反对一切国家，否认任何权威

巴氏脑子里的那套超阶级人性论，导致他在对国家的认识上也是荒唐无稽的。列宁明确的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统治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工具*”。

国家是镇压和暴力的工具。[5]

国家在原始公社时期是不存在的，随着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阶段，奴隶主阶级要对奴隶阶级实行残酷的阶级统治，完全剥夺他们的劳动成果，因此激起了奴隶阶级激烈的反抗。为了镇压反抗，就需要建立专门的暴力机关——国家来代替以前氏族和部落的管理机关。最初的国家是如此产生的。

而巴氏却本末倒置地胡说国家才是产生私有制和阶级的根源。胡说什“*资本家只是由于国家的恩赐才拥有自己的资本……废除国家，那时资本就会自行完蛋。*”[6]。

他用形而上的观点看国家，无视不同国家阶级本质的不同，认为任何国家的统治都表现为剥削和奴役，称“这是对人性的否定”。

“这个权威是叫做教会，君主国，立宪国，资产阶级共和国，或者是革命专政，都不重要。我们一律把他看作是剥削和专制制度的必然的根源而加以仇视和反对。”[7]

巴枯宁既不知道何谓国家，也不知道国家将是怎样消灭的，他完全颠倒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他不问阶级实质反对国家，实质上就是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恩格斯指出：

“广大的杜会民主党工人群众都和我们抱有同样的观点，认为国家权力不过是统治阶级——地主和资本家为维护其杜会特权而为自己建立的组织，而巴枯宁却硬说国家创造了资本，资本家只是由于国家的恩赐才拥有自己的资本。因此，既然国家是主要祸害，那就必须首先废除国家，那时资本就会自行完蛋。而我们的说法恰巧相反：废除了资本，即废除了少数人对全部生产资料的占有，国家就会自行垮台。”[8]

马克思针锋相对地指出，在推翻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后，需要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

只要其他阶级特别是资本家阶级还存在，只要无产阶级还在同它们进行斗争(因为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4 年，第 256 页。

[5] 《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第五章第二节。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3 年，第 390 页。

[7] 巴枯宁《国际兄弟革命组织的纲领和目的》。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3 年，第 390 页。



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无产阶级的敌人还没有消失，旧的社会组织还没有消失)，无产阶级就必须采用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如果无产阶级本身还是一个阶级，如果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消失，那么就必须用暴力来消灭或改造这种经济条件，并且必须用暴力来加速这一过程。[9]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10]

三、主张“完全放弃一切政治”，反对进行任何政治运动

巴枯宁认为国家是一切祸害的源头，因此，他认为不应当做出任何事情来维持国家的生命，而应当完全放弃一切政治。他说：“*任何政治运动都是反动的*”[11]“*进行政治活动，尤其是参加选举，那是背叛原则的*”[12]。

他认为废除国家，建立无政府社会，不是依靠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阶级斗争，而是在他那样的天才人物带领下，以流氓无产者和破产农民为核心进行“社会革命”。这种“社会革命”不需要准备和积聚革命力量，不需要如列宁和毛主席那样对阶级力量对比做出极其客观精确的分析和判断，只要少数精英骨干执行密谋活动，就可以在二十四小时内一举完成消灭国家的壮举，并美其名曰“社会清算”。在这里，巴氏充分地暴露了自己唯心英雄史观的本质。

马克思指出：“*一切运动本身必然是而且从来就是政治运动。*”放弃政治运动是根本不切实际的。

政治斗争是工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13]

巴枯宁在政治上搞所谓的反权威主义，实际上就是“*在否定政治的幌子下使工人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的统治。*”[14]

恩格斯指出：

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

[9] 见马克思《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64 年，第 694 页。

[10] 见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63 年，第 31 页。

[11] 见《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64 年，第 376 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3 年，第 391 页。

[13] 《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第五章第四节。

[14] 见《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41页。

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15]

毛主席对这种不问性质反对一切政治权威的观点做出了精辟的批判：

无政府主义不是不要政府，只是不要别人的政府，只要他自己一家的政府。[16]

反对进行任何政治活动的巴枯宁主义者直接给革命带来了破坏。在《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中就提到，在1873年的西班牙，巴枯宁分子是如何直接的破坏革命的。在西班牙——

在制宪议会大选前夕，巴塞罗纳、亚尔科及其他地方的工人要求说明，在议会斗争以及在其他一切斗争中，工人应该遵循什么政策。为此目的，举行了两次大会：一次在巴塞罗纳，一次在亚尔科。在两次大会上，同盟分子都极力反对明确规定一条国际〈nota bene〔请注意〕：他们的国际〉应当遵循的政治路线。于是决定，国际作为一个组织，根本不应该从事政治活动，但是国际的会员可以由自己负责去任意行动，并且可以参加他们认为适当的任何党派，——因为他们要实行臭名昭彰的自治。实行这种荒谬学说的结果如何呢？——国际的基本会员群众，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在内，在没有纲领，没有旗帜，没有自己的候选人的情况下参加了选举，结果使得当选的几乎完全是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只有两三个工人被选入议会，但他们根本不代表任何人，他们从来没有挺身捍卫我们阶级的利益，而总是心安理得地投票赞成议会多数提出的一切反动提案。

这就是巴枯宁主义的“放弃政治”的结局。[17]

四、鼓吹以“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革命的起点

就如同巴枯宁把国家和私有制两者的关系颠倒了一样，巴氏在继承权问题上也是本末倒置的认为是继承权产生了生产资料私有制，而不是经济基础（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上层建筑（法律）。因此，他认为社会革命应该从“废除继承权”开始，他说：“*只要遗产还存在，就将存在世袭的经济上的不平等*”，即“*人为的阶级的不平等*”；只要废除继承权就可以实现“*阶级之间的平等*”。

马克思反驳这个谬论时说：

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反动的。[18]

理论上的错误前文已经指出，它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者关系倒置。“*不把继承权看做法律后果，而把它看做现今社会组织的经济原因*”。[19]

[15] 见恩格斯《论权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64 年，第 344 页。

[16] 《解放日报》1967 年 8 月 24 日。

[17] 见恩格斯《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64 年，第 523 页。

[18] 见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人民出版社，1964 年，第 415 页。

[19] 同上。

它在实践上是反动的，在于“*承认废除继承权是社会革命的起点，只能意味着引诱工人阶级离开那实行攻击现代社会真正应持的阵地*”[20]。

这句话的解释就是，巴枯宁竟认为不通过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革命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来变革生产关系，而试图通过解决一个私有制的表象问题来推翻整个资产阶级私有制。须知：

社会主义关系不可能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产生。社会主义关系是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产生的，这时劳动人民的国家把生产资料、工厂、矿山、运输业、银行等等资本家财产国有化并把它变成公有的，社会主义的财产。很明显，在政权转入工人阶级之手以前是不可能这样做的。[21]

巴枯宁急忙着想废除资本主义关系，但无视社会主义关系不能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产生的客观现实，却妄图把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否定了，试图把工人阶级引上他那条压根行不通的邪路。

并且，宣布废除继承权，“*会使全体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团结在反动派周围*”。因此马克思说道“*废除继承权不会使社会革命开始，而只会使社会革命完蛋*”。[22]

五、主张在无政府社会里实行集产制

我是个集体主义者，而不是共产主义者……因为共产主义将不可避免地使财产集中在国家手里。[23]

他反对生产资料国有化，主张在建立无政府社会后，通过自由联合自下而上地实行“集产制”。

所谓“集产制”，就是土地归农民，工厂归工人，建立工业、农业组合，分散经营、各自为政互不相干，反对任何自上而下的统一领导和计划经济。这种“集产制”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根本不同，它必然会加剧自由竞争和阶级分化，使资本主义泛滥成灾。可见这根本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而压根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资本主义。

[20] 同上。

[21] 《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第五章第四节。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人民出版社，1964 年，第 652 页。

[23] 巴枯宁《在和平和自由同盟 1868 年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简论服务业政治经济学

壮壮

编者按 本文首发于红色中国网。

微信公众号“三秦学子君”上的《服务业高利润的秘密（上）——以西安某早餐公司为例》[1]一文引起了笔者的头脑风暴。这篇以完备实际调研为基础的文章，给研究目前十分热门的服务业提供了绝好的素材，笔者想简要地以政治经济学方法来利用这些材料。

“服务业中的早餐公司”[1]为什么办得起来呢？因为大城市里有太多“苦逼的上班狗”[1]了，他们“忙碌了一天之后加个班回家熬会夜早上匆匆忙忙起来，来不及精致地拾掇一下自己就又忙着挤上人头攒动的地铁”[1]……在开始工作前，他们的“美好生活需要”[1]只是“好吃又不贵”[1]的早餐，比如“一杯豆浆加两个包子”[1]。

生动形象的语言不会直接有助于深入研究，但对发现问题却绝对有重大帮助。在政治经济学中，一般研究的是等价交换：认为商品的交换价值和买卖价格没有差别。但在现实中，考虑到资本疯狂的逐利性等因素，这样的情况往往只发生在实力具有可比性的经济单位之间：实力强的一方总会想尽一切办法以低于价值的价格买入、以高于价值的价格卖出，而实力弱的一方不得不接受被盘剥的局面。

文章[1]中研究的早餐公司，是从餐饮公司买进包子等原材料的。根据文章作者的调查结果，包子是大量按箱出卖的，可见卖食品给早餐公司的餐饮公司不是小作坊，而是比较大的企业。在早餐公司买进原材料的过程中，买卖双方的实力大体相当，交易可以看做是等价交换，与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相符。

但卖出成品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了。消费者是一群“苦逼的上班狗”[1]，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对于价格能承担得起又必需的东西，是一定要照价买下的。这时候发生的交换，一般说来不是等价交换：早餐公司卖出熟包子和热豆浆等餐点的价格，应该高于餐点的价值一个不低比例。

“该公司每个摊点：每月的营收为 30000 元，成本为原料费用和人工成本 15000+3600=18600 元。”[1]，可以确定的是每个摊点每月卖出餐点的价值明显在 3 万元以下 1.86 万元以上。但考虑到现实中的各种变动因素，餐点的价格到底比价值高了多少却是一个难以确定的问题。如果假定价格比价值高了 1/5 也就是 20%，那么每个摊点每月卖出餐点的价值为 3÷(1+20%)=2.5 万元。

这样的话，利润为 2.5-1.86=0.64 万元，原料费用 1.5 万元，人工成本

0.36 万元，一个摊位每月的投入为 1.86 万元，月利润率为 0.64÷1.86=34.4%。即便不考虑买餐点时价格明显高于价值这一极其有利于获利的情况，政治经济学意义下早餐公司的利润率仍然相当高，差不多是“2019 年全国规模以上企业主营业务的利润率”“5.86%”[1]的 6 倍（5.9 倍，文中没有给出规模以上企业的利润率是怎么算的，但根据笔者过去的计算结果[2]看大体合理）。

人工劳动给原料增值 2.5-1.5=1 万元，比人工成本高 1-0.36=0.64 万元，即剩余价值为 0.64 万元，剩余价值率为 0.64÷0.36=1.78=178%。接近 180%的剩余价值率！不考虑价格高于价值这一因素，政治经济学意义下剥削仍然十分深重。

价格高于价值 20%只是一个假定，根据这一假定计算得到的结果大体合理。但这并不准确，价格提高的比例可能是别的数值，做出其他假设后可以按照同样方法得到和政治经济学概念相关的结果：若价值高于价格 25%，那么每个摊点每月卖出餐点的价值为 2.4 万元，利润率为 29.0%，差不多是“2019 年全国规模以上企业主营业务的利润率”“5.86%”[1]的 5 倍，剩余价值率为一倍半也就是 150%，剥削很深重；若价值高于价格 15%，那么每个摊点每月卖出餐点的价值约为 2.61 万元，利润率为 40.3%，差不多是“2019 年全国规模以上企业主营业务的利润率”“5.86%”[1]的 7 倍（6.9 倍），剩余价值率超过两倍达到了 208%，剥削非常深重

现实中一个早餐公司典型摊位的月利润率更高：(3-1.86)÷1.86=0.613=61.3%，超过“2019 年全国规模以上企业主营业务的利润率”“5.86%”[1]的 10 倍。刚得到这个结果时，笔者觉得自己可能点错了小数点，但经过校对以后发现没错：实际利润率就是高到了离谱的地步。（有一点在数学上意义重大：投入比卖餐点的收入为 1.86/3=0.62，大体上和利润比投入 0.613 相等，这两个比值都十分接近黄金分割比例 0.618，看来黄金分割真的能给资本家创造大量黄金啊！）

前面通过估算得到了政治经济学意义下很高的月利润率，约为 30%—40%，但这不影响早餐公司的实际月利润率更高且超过 60%的现实；用同样方法得到的剩余价值率大体上为一倍半到两倍，剥削十分深重，但这不改变“工人每挣一块钱的工资，就要为资本家创造超过三块钱的利润”[1]的更残酷的现实。

但笔者并不认为消费者被痛宰了。《我不是药神》里主角经营的平价药生意是这样的：印度仿制药“格列宁”的出厂价是 500 元，经主角运到国内卖给患者至少要涨到三四千元。销售价格是出厂价的 6—8 倍，一转手就大幅度涨价，提高了 500%—700%。这还是走私的仿制药，效果一样的正版药价格会高达到它的 10 倍……与这样的暴利相比早餐公司不愧为“民生工程，

示范企业”[1]。

也许再多办几个这样的“民生工程，示范企业”[1]就能改变早餐价格高于价值的现实：很自然的想法是几个大的早餐公司竞争会导致价格降低。但要知道，大型早餐公司再多，也远远少于“苦逼的上班狗”[1]：一个二线城市有 30 万想买早餐的“苦逼的上班狗”[1]，这很可能是偏低的估计；同一个城市里有 3 家早餐公司——每家 1000 辆餐车，这很可能是合理的假设。

平均每个公司至少对应 10 万没有议价能力的消费者，数量差异大到这种程度本身就意味着垄断，同行间的竞争改变不了什么。3 个公司很可能达成价格协议，不论是通过协商自觉达成的还是在经营过程中自发达成的。而“苦逼的上班狗”[1]却不可能让 100 个同类不买其中某个公司的产品，更不可能让 100 个同类不买早餐公司提供的早餐；即便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最多也只是让某公司可能的顾客减少千分之一，改变不了早餐的经营格局。

3 家早餐公司的价格表很可能有一定差别，这就会导致竞争。但竞争的最好结果也只是不同公司的早餐消费水平基本一致而已，上班狗还是得在 3 家中做出选择来解决早餐问题，要付的钱基本上还是那么多：如果竞争导致了更强大的早餐垄断业务，付的钱会更多。不能指望通过大公司间的资本主义竞争改变消费价格明显高于产品价值的现实，不变得更高消费者们就该谢天谢地了。

垄断收益本就是大型企业利润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前面的估算结果表明：如果不考虑价格高于价值的垄断因素，早餐公司的利润率少则下降 1/3（40%与 60%），多则下降一半（30%与 60%），如果不是还要更多的话。买卖价格与商品价值的差别往往会对单个企业的经营活动产生明显影响，考虑小范围的业务时不能忽视这样的差别。

但对于“全国规模以上企业主营业务”[1]这样大范围的经营而言，价格与价值的差别影响却不会很明显：这样的差别会改变不同企业对利润的分割，却不会改变利润的总量，在全国层面考察大企业时很多不等价交换已经包含在要考察的业务中了；这些企业进行的是社会化程度很高的生产，本身都具有一定的实力，与它们有业务往来的企业往往也在进行社会化程度很高的生产，彼此实力相当，整体上看价格与价值不会有明显偏差。（当然，即便把全国规模以上企业看做一个整体，它们也可能在不等价交换中获利，不过靠这种手段获得的利润与通过榨取劳动者剩余价值而获得的利润相比，明显少很多很多。）

鉴于两者实际利润来源的这种差别，直接拿实际利润率比较意义十分有限：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下，这其实是比较两种不同的东西。那该怎么做呢？拿政治经济学意义下早餐公司大约 30%—40%的利润率同“2019 年全国规模以上企业主营业务”“5.86%”“的利润率”[1]相比吗？那样早餐公司的利润

率大约就是规模以上企业的 5—7 倍了，虽然比 10 倍小一些，但差别真有这么大吗？

早餐公司的利润率就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下的利润率，一点儿也没有考虑利润的分割问题；但对“2019 年全国规模以上企业”考虑的却是“主营业务”“的利润率”[1]而非政治经济学意义下的利润率，现实中的业务不可能不存在不同利益集团对利润的分割：国家机器要来收税，金融资本集团要收取贷款利息……两种利润率的计算还是不同东西，不能直接比较。

目前笔者无法确定现实中利润分割的具体比例，只知道企业的利润率被其他利益集团分割走了不少但又不会太多，政治经济学意义下“2019 年全国规模以上企业主营业务”“的利润率”应该明显高于“5.86%”[1]，但又不会高太多。假定利润被分走了大约一半，那么政治经济学意义下“2019 年全国规模以上企业主营业务”“的利润率”应该在 11%—12%之间，约为早餐公司的 1/3。

在同一标准下，早餐公司的利润率仍然比规模以上企业高得多，这种不算太离谱的差异应该可以用服务业有机构成较低来解释，残酷剥削带来的高剩余价值率是解释不了的，因为各行各业的剥削都很残酷。

有机构成代表某业务中的技术水平，大体上是指经营中的物质成本（不变资本）比上人力成本（可变资本），有机构成越高意味着该业务技术水平越高。前面说过，在本文研究的早餐公司中：每月一个摊位的原料成本为 1.5 万元，大体上可以当做物质成本；一个工人的月工资为 3600 元，差不多可以当做人力成本。两者相比，可以得到有机构成约为：15000:3600=25:6=4.17:1。

在这里笔者想让考察更严密一些，物质成本其实还包括餐车的损耗，人力成本其实还包括工人从保险中获得的利益。笔者知道这两项明显少于原料成本和工人工资，但没有掌握准确数字。“缴纳餐车和餐车罩押金 3115 元”[1]，假定这些用具可以正常使用一年多（比如十五六个月），那么用具每月损耗约为 200 元；由于“工人没有社保，只有工伤保险”，不妨假定工人平均每月从工伤保险中受益 100 元——很可能是高估了。

这时物质成本为 15000+200=15200 元，人力成本为 3600+100=3700 元，有机构成为 15200:3700=4.11:1。不妨仍然像本文前面那样假设：一辆餐车每月生产的食品价值为 25000 元，销售总额为 30000 元。一个月的人工劳动使产品增值 25000-15200=9800 元，超出人力成本 9800-3700=6100 元，这就是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率为 6100÷3700=1.65=165%，差不多是 5/3。总成本为物质成本加人力成本：15200+3700=18900 元，利润率为 6100÷18900=0.323=32.3%，差不多是 1/3。

前面估计剩余价值在一倍半到两倍之间、利润率率在 30%到 40%之间大

体上是正确的，比较准确的估算仍然显示剥削很残酷、利润率很高。但这些仍然没有资方的实际获利更让人震惊：一辆餐车每月利润为 30000-18900=11100 元，利润率为 11100÷18900=0.587=58.7%，这倒真像是“2019 年全国规模以上企业主营业务”“5.86%”“的利润率”[1]点错了小数点；111000÷3700=3=300%，工人每赚 1 元钱，资本家正好获利 3 元。

但如果没有较低的有机构成，即便资本残酷剥削工人，也无法获得较高的利润率。前面的计算结果是早餐公司的有机构成约为 4:1，假定某业务的有机构为 14:1，剥削强度与早餐公司相同：剩余价值率均为 165%，那么这一业务的利润率为 165%÷(1+14)=11%，和前面估计的“2019 年全国规模以上企业主营业务”“的利润率”差不多，只有早餐公司利润率的 1/3 左右。

高有机构成意味着相对于人力成本来说更多的物质成本，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本才能榨取到剩余价值。技术水平的提高是时代发展的大趋势，这同时意味着一二产业的有机构成明显提高，而资本的利润率就会显著下降。靠更残酷的剥削并不能改变这一点，就算把劳动强度提高到剩余价值高达 200%的程度，如果有机构成为 24:1，利润率也只有 200%÷(1+24)=8%，明显地降低了。且工人能承受的剥削强度并不是无限的，加大工作强度会导致劳动力的维护费用也就是工资不成比例地大幅度上涨，对于资本家来说不划算。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追求更多利润，资本进军有机构成较低的领域势在必行，低端服务业就是这样的领域。时代趋势也为这一领域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随着生产技术的发达，即一二产业投资中不变资本占比的增加，这两类产业的就业人口是相对下降的，即可以用较少的时间和人力生产出同样多的产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被‘排挤’出来的就业人口只能从‘第三产业’中谋出路。”[1]

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趋势的契合让大公司在低端服务业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考虑资金周转速度的话，早餐公司真的是以极小的投入换来极大的利润：根据公众号上文章[1]的计算结果，“月利润率”超过 6 倍，“年利润率竟可以高达”75 倍还不止，注意这里可没有百分号。

利润率高到这么可怕的地步主要是由于资本的快速周转：“货款也不经过工人，而是通过付款二维码直接直接打入公司账户”，“对每个新开张的摊位，公司每月初只需要投资 500 元，假设货物每日卖完，则每个月内，除了工人的工资，它只需要投入 500 元的资金。因为货款在每个销售日结束之后就已经回笼了”。[1]

笔者根据自己的修正结果也计算了考虑资本流动性以后的利润率：“公司每个月为每个摊位付出的成本为”3700+200+500=4400 元，“利润为”30000-4400=25600 元，“则月利润率”m=25600÷4400=5.82，“而年利润率竟可以高达”M=12m=69.8。[1]月利润率接近 6 倍，年利润率几乎有 70 倍，修正

后的利润率略有降低，但仍然是极高的。

大好的赚钱机会，快来把握啊！早餐公司“甚至还可以有”空手套白狼“这样的骚操作：每个工人缴纳的押金是 3000 多元，而餐车的成本则不超过 2500 元，则该公司甚至可以从零成本开始进行资本积累。”[1]从白手起家到千万富翁就是这么简单：“按 1000 个摊位计算”“每年的”“利润额为 1.368 亿”[1]，就算考虑到笔者的修正，利润也还是超过 1 个亿，就算再考虑利润的分割，业主的年收入也应该能达到以千万计量的程度。

这个机会难道不是谁都能把握的吗？为什么“苦逼的上班狗”[1]没有靠这样的经营改变自己苦逼的命运呢？

因为这样的经营从一开始就与大多数人无缘：就算把开办早餐公司的门槛儿降得再低，也需要购买 1000 辆餐车，就算一辆餐车的价格只有 2500 元，那也需要多达 2500×1000=250 万元的现金。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查查自己的银行账户，看看这么大一笔初始投资有谁拿得出来吗？如果你只能维持基本生活甚至还欠着钱呢，那当然就别想了。不幸的是网上有不少这方面的材料，讲中国人平均欠债多少万，中国民众的财产中房子、车子等用于维持基本生活的不动产占了多么多么大的决定性比重。绝大多数人绝对拿不出这么多钱——财路还没开始就断了。

还有，即便你真的拿出了那么多现金，真的开办了一家早餐公司：规模和前文研究过的差不多，你也未必能赚到像那家早餐公司那么多的利润。因为你的公司还一定得和遍布大街小巷数量庞大的早餐业务个体户竞争，要想赚上亿就必须得获胜，而单考虑经济因素无法保证这一点。

前面假定早餐公司一辆餐车每月的物质成本为 1.52 万元，成规模使用会降低单位成本，应当认为 1.52 万元是经营 1000 辆餐车的平均成本。如果某人单独经营一辆餐车，成本一定会高一些，不妨假定每月物质成本为 1.7 万元。假定这一个体户加工食品的能力与早餐公司的餐车一样，一个月加工出来的食品总价值为 2.5 万元，而且他很厚道，不像早餐公司那样把价值 2.5 万的商品卖成 3 万，而是等价按 2.5 万元出售，那么他每月能赚多少呢？很少吗？2.5-1.7=0.8 万元，也就是 8000 元，这就是一个个体户的月收入，超过早餐公司员工每月工资或收益（3600 元或 3700 元）的两倍。

在早餐业务这一行里说个体户价钱公道赚得又挺多，笔者是相信的。个体餐车对“苦逼的上班狗”[1]来说益处多多，但却是早餐公司营利的大敌：毕竟有便宜的谁还买贵的呢！要想让早餐公司的利润有保障，就要把小贩的经营活动差不多清理干净，所以文章中才会这么写：“某家优秀餐饮公司的摊点，和城管是互利双赢关系”[1]，“还有不可忽略的一部分成本是城管或各个街道的管理费。这部分费用可能不小，要不然数量庞大的城管队伍每天热心地驱赶地摊小贩是为了什么？能够霸占一个省会城市的主要路口，怎么

说也得出不少血吧”[1]，把分割利润的去向和动机讲得清清楚楚。

要想成功地经营早餐公司，至少还要与城管接洽，人脉资源的要求让范围又缩小了不少：就算真能靠经营早餐公司致富，那也是极少数人的事儿。

现代社会中，成规模的经营从来就不只是经济活动，一定要有政治因素作为保障。政治对经济活动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比在之前的任何社会形态中都明显（但有很多资产阶级学者恰恰在回避显而易见的事实：研究纯粹经济学），恐怕这也是对政治经济学这个学科名称的一种解释。

规模经营中的经济利益是非常巨大的，前文计算得到一辆餐车每月利润为 11100 元也就是 1.11 万元，1000 辆餐车的利润就是 1110 万元。对利益的集中分配就是资本主义政治最重要的一环，和前文一样假定分割出去的利润占经营利润的一半，那么分割出去的利润就有 1110×1/2=555 万元：作为交给国家的税、对城管或其他各级领导的回报……而经营早餐公司的最终月收益同样是 555 万元这么多。

假定收益在 3 个老板间平均分配，那么每个老板的月收入高达 555÷3=185 万元；哪怕一个工人把她的全部 40 年职业生涯都交给早餐公司，总收入也只有 3700×12×40=177.6 万元。工人辛辛苦苦忙一辈子，还不如老板清闲一个月，阶级差别在数字中体现得清清楚楚啊！

大力发展服务业的确会使得“国家和资本家实现了双赢”[3]，但双赢的前提是残酷剥削早餐公司的劳动者、断绝街边小贩的生路以及盘剥作为消费者的“苦逼的上班狗”[1]。（那么国家代表谁的利益还不清楚吗？）

这样压榨全社会的如意算盘可以一直打下去吗？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中，正常情况下哪怕是二线城市里每天也总有几十万人排队等着买早餐，早餐公司的生意似乎不成问题。但目前严重的新冠疫情不能不让人想到其他可能：由于疫情严重，大家都不上街买早餐了。早餐公司的销售额骤减，维持经营就意味着严重亏损，那么资本家就完蛋了吗？让我们估算一下吧！

根据前文，正常情况下一辆早餐车的月销售额为 3 万元，若一个月有 30 天，那么每天的销售额为 30000÷30=1000 元，共有 1000 辆餐车，那么正常情况下该早餐公司的单日销售额为 1000×1000=100 万元。根据文章中的调查结果可知食品卖出价是买入价的 2 倍，也就是说该早餐公司每天上货需要花 100÷2=50 万元。（即便只考虑高达 50 万的单日流动资金量——至少有这么多，绝大多数人的经济条件也不足以支持成规模经营，何况经营中还有变数。）

假定疫情期间公司仍正常进货，原料共 50 万元；单日销售额骤减为 20 万元，相当于卖出了 10 万元的原料。还有 40 万的原料没卖出，“如果货物滞销，公司接受退货，但个人需承担 30%的损失”[1]，工人要交给老板 40×30%=12 万元，这样的一天公司亏损 50-20-12=18 万元。

假定公司的正常进货从月初到月末维持了 30 天，那么经营中公司就亏损了 18×30=540 万元，月末还要给工人发工资及工伤补贴共计 3700×1000=370 万元，还有餐车的损耗总费用为 200×1000=20 万元，把这些加起来，公司本月一共亏损 540+370+20=930 万元。一个月就亏了这么大一笔钱，怎么说公司的老板也要垮了吧！

得了吧！这亏损的还没有正常情况下公司一个月的毛利润 1110 万多，就算和每月净利润五百多万相比，也还不到两个月的。哪怕是经营了一年的早餐公司，也有能力消化掉风险，何况公司很可能已经成立十几年了[1]！

假定之前 11 个月公司都是正常经营的，每月获利 555 万元；假定 3 个老板都过着每月消费 100 万元的奢侈生活，那么还能净剩 555-100×3=255 万元用于应对可能的风险，11 个月共能积累 255×11=2805 万元，是本月亏损额的 3 倍还多。刨除本月亏损也还剩 2805-930=1875 万元，就算平均到 3 个老板头上，每个老板也还有 1875÷3=625 万元，根据前边的估算，三百万是可以做一笔有效投资的，每个老板的结余就可以做两笔有效投资。如果他们仍然愿意合伙，还可以做更大更有效的投资。

如果疫情继续发展下去，老板们可以不经营早餐业务改行干别的；如果疫情趋于缓和，早餐公司完全可以继续经营下去。不论在那种情况下，他们的业务都可以变得更加丰富和有效率，真的不需要替资本家们担心！

但公司工人呢？虽然之前 11 个月工人正常领了工资，但那些钱不过是刚够维持生活罢了，不会留下什么保障性的东西，省会城市里将近一年才 4 万又能剩下什么呢？（3600×11=3.96 万元，3700×11=4.07 万元，差不多有 4 万。）

到了当下这个疫情肆虐的月份，每天 1000 个摊位一共要向公司上交 12 万元的损失费，平均每个摊位上交 120000÷1000=120 元。不考虑工伤补助，正常情况下工人一个月 30 天赚了 3600 元，平均 1 天工资也是 3600÷30=120 元，正好等于上交给公司的损失费。疫情会导致工人白白辛苦一天，一般说来干到月末就是白白辛苦一个月，毕竟工伤补助不会真正发给大多数工人。

疫情肆虐的这个月工人过得真的很痛苦，那么下个月呢？如果疫情缓和，老板们觉得早餐业务能赚钱，他们便还要继续之前被残酷剥削的经历。如果疫情继续肆虐，老板们觉得再经营下去还会继续亏损，那么在公司解散之后他们便要自谋生路了。估计这些工人还要找一份差不多是同样辛苦的工作，而转换工作的开销和风险还要他们自己承担。

正常经营的时候，资本家和国家赚得盆满钵盈，工人受着残酷剥削：起早贪黑也只能温饱；出现问题的时候，资本家和国家可以靠赚来的钱有效规避风险：甚至工人的血汗钱也被搜刮来用于赔偿损失，而工人却只能一无所



有地面对所有风险。概括地说，这些就是大办服务业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参考材料

[1] 三秦学子君.服务业高利润的秘密（上）——以西安某早餐公司为例.[2020.5.6].https://mp.weixin.qq.com/s/MruSiJPIowjmkfKDo3XR8A

[2] 壮壮.与否定“中帝论”的同志们谈谈垄断利润问题.[2018.10.17].https://mp.weixin.qq.com/s/BaJdPoSw6q_DvXDtah5RIQ

[3] 三秦学子君.服务业高利润的秘密（下）——大力发展服务业意味着什么？.[2020.5.11].https://mp.weixin.qq.com/s/bu9dWbTcX8LOqCKo9AEbRQ

全 世 界 无 产 者 ， 联 合 起 来 ！